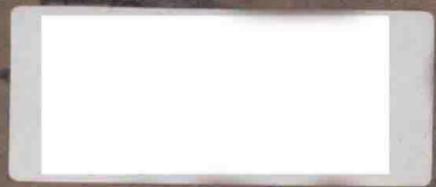


讀

書

問

先旦自署



近年來之知識介紹

中國今日窮極矣，而智識事業不倖免焉。經濟家言生產，新知識之增加，亦一種生產也；而此則幾等於零。經濟生產之一法，在利用外國資本，猶之治學問者必善用西學方法，而此善用之事實頗不習見，是新學識無由產生之一大原因也。學問雖不自產生，而所謂智識階級者固不能不談學問以自存；於是種種假借之法以生。其最要者厥爲外國學問之介紹，猶之工商界不能自製自賣，不得不仰給舶來物品，以爲搪塞。

顧外國學問之介紹不能不有相當之標準與限制，否則流弊滋甚。環顧近年來出版界，此種標準與限制，可云絕少。於是生淫濫與膚淺種種弊病。

試翻閱流行之若干定期刊物，可知介紹西方現存智識之文字，至少居十之七八。最顯而易見者爲譯文；其次，集若干文稿，略加編訂；再次，就某本西書或某篇文章，改頭換面，顯屬西人所謂 *Re-view* 之作，而不居其名。譯稿或編譯之稿往往僅具原著之姓名，而於原登之刊物，年月，及作者之身分，了不敘明；於身分一端，譯者或竟茫然，亦自無從敘起；最甚者且並原著者之姓名而略之，第言某某譯，卽算了事。中國之讀者易與，亦竟視爲當然，不加指摘，

於是其闕漏乃愈甚。此淫濫之一端也。

自然現象，覆載之內，大致相同，且其性質超越人事範圍之外，故自然科學之智識，盡量介紹，不嫌其多。社會現象，則因時因地而異，其受文字上之介紹，即宜有相當之限制。至社會學說，即在歐美認爲可行者，在中國未必可行，操筆事介紹者尤不宜不審慎又審慎，況其不成學說，缺乏相當之事理根據，而西方通人猶認爲不可行者乎？即馴良如基督敎，一經與一地之背景對照，即可發見其格格不入之處，遑論其他。橘逾淮爲枳之說，歷來言西學者每每夷視之；及至今日，所謂枳者且開花結實，舍斧斤外已苦無應付之法，乃漸有人議論及之，不已晚乎？此淫濫之又一端也。

近年來習見之文字，所論議者大率不出哲學，教育，社會學數種範圍。豈中國學者於此三種學問之興會獨深，或中國社會所仰望於此三種學問者獨大耶？殆未必然。茲三種學問者，範圍至大，包羅至無限，精究之困難，而欲於中撷拾一知半解以爲作稿之資料則絕易也。此在讀稿者或未必知，而在集稿或編稿者必大有以實我說。一稿之標題，曰緒論，曰概要，曰原理，曰大綱，曰要義，曰述略，至於層出不窮。我嘗語人：中國人言西方學問，不知運命中究有擺脫『引論』與『要義』之一日否；設不能者，曷不自今日始，放棄學問不談，省些精神目力，以爲他用？中國舊日之學問家，本喜爲寬泛不着邊際之論；然當日善談者不多，從而受教者亦有限，其發爲文

章付諸割闕者更不常見；今則自大學教授以至中學學生，人人有講人生觀，教育原理，與社會問題之權利與義務，從之者既如雲；而印刷業又甚發展；今昔相較，形勢懸殊矣。夫以有限之學問，供無窮之舖張，宜膚淺程度之日深也已。

膚淺之病，不僅於短篇之作品見之，其較大之編譯品亦未能免。近年來各書坊之出品中，有所謂百科小叢書，常識叢書，新時代叢書及各種百科全書等，其內容大都淺率簡陋，鮮有可以稱為著作者。為普及計，此種淺易之作，殊不可無；然在同類科目上比較高深或專門之著作，或譯作，則絕不多觀。循此以往，行見常識二字，將為膚淺之代名詞，而為不學無術者之護身符矣。昔當譯學初階西方

重要名著之譯行，尙不在少數，今則並此而無之；而教科書，普通常識之書，在歐美學術界未必有相當位置者，則譯者羣趨之。是又豈智識介紹之正軌也哉？

中國介紹西學之初期有一大弊病焉，曰附會。有新學說或新智識於此，介紹者必於舊籍中覓一大致雷同之理論或事實而對比之，甚或沿用其名詞，不以爲異；今日流行之『共和』，『革命』，其尤著者也。今日之介紹西學者鮮有犯此病者。此其變遷與國人對於中西文化之態度有絕大關係。西學初東，國人每鄙夷之，間有一二教士編譯關於科學之書籍，智識階級不之重也。及知西學不可不習，於是從事介紹者日多；願其於國學之根柢尙深，其對之之信仰尙重，

故當其從事介紹也，常持中西學問互相發明之說，而已則居其間爲發明之人；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今則國學有根柢者日少，社會對於西方文明之倚賴與崇拜日深，甚至甘受其奴使而不知恥；從事介紹者，文字尙多未通，自未遑斤斤於舊說之參考矣。此新舊二態度者，皆失之主觀偏激，非學問與文化之福利也。

智識介紹事業之所以有今日者，舍上文信仰西學過深之一原因外，尙有二大原因：一曰民衆化，一曰商化。非人人可與語人生觀，社會理想，及各種智識也；而近代所謂思潮者，似謂非人人有正確之人生觀與社會理想與充分之各種智識，不足以言社會進步；於是發爲議論，著爲政策，務使引車賣漿倒糞之流，得沾澤化。意非不

盛，無奈行之之結果：澤未下被，而學問已蒙淫濫淺陋之病何！哲學家與教育家既倡之於前，著作家與出版家自必從而和之於後，自此非淺易之文不作，否則將無讀衆，非通俗之書不印行，否則將無買主，而讀衆與主顧之多寡，一視淺易之程度而差，誠以不如此不足以順合潮流也。夫一端有淺率易與之讀者，一端有惟利是圖之出版界，而居其間者復有多數專恃稿費爲生活之學問家與藉稿費爲補助之學生，從而擴大其供求；求供之間，一推一挽，而知識介紹事業乃若水之走阪，愈趨而愈下矣。

教授爲學問之大敵說

這是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詹姆斯 *Wm. James* 與英國大致同派的哲學家歌雷 *F. C. S. Schiller* 談話中間的一句。這句話究作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歌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歌雷的話。『一行學問的旨趣，在使學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響天天擴大出去。』這行學問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鞏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權威。他的方法，便在使這行學問越變越專門。

越專門，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來批評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覺得自己超凡入聖。……他的專門名詞越來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長此不改，不論那一行學問，必有教之不得學之不屑的。』 (Tanaka, 1924, 1111—1114頁) 所以說，一行學問的大敵，便是這行學問的教授。這是第一說。

孔子說：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近世所謂科學精神也不外這四個大字。這可以說是學問家的四條清規，面子上，做學問的教授們似乎都很守清規的，事實上，一條不犯的，却尋不出幾個來。大凡一個究研生，一個助教，總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後來，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貢獻，便要自稱或加入某個派別。一有了派別，西人

所謂 School，於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發達似一天。他未嘗不繼續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點不免十分偏狹；這便是犯了固字與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來的方法是不大謹嚴的，到此也許更要犯意字必字兩個毛病。

這許多毛病，在哲學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謂系統的哲學家，我看無一倖免。科學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數派或兩派對峙的局勢是常見的。極端的達爾文派與極的拉馬克派對峙；雷勃的機械派與杜里舒的生機派對峙；皮耳孫的統計遺傳派與達文包的曼氏遺傳派對峙；行爲心理派與意識心理派對峙。諸如此類，在從事的幾位教授，雙方鈎心鬪角，容有相當興趣，但在那一行學問方面，却多少

不能不受打擊。研究一行學問的教授，一有派別，這一行學問，在那位教授手裏，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鎖了。教授是學問的敵人，這是第二說。

這兩個說法，第一說似乎不適用於中國的教授；因為大多數的連一行學問的術語都記不清楚，遑論播弄他來嚇人。第二說比較適用些。中國教授近來也有派別了。不過他們的派別，很少是自己的本領賺來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機會教他，他自以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說話，替那一派辯護。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學者，那有不願意追隨驢尾的呢？記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國某大學，在某大教授下專攻某科；他的談吐主張，不知不覺就

入了他老師的派別，開口閉口的是『我師』『我師』。後來他畢業了，轉入另一大學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聽見他提起他的老師，吐屬也從此不同了。我看中國教授所自標或自期許的派別，多數是如此得來的。

然而中國教授所以爲學問之大敵者却不在此。他們大多數除了介紹西方幾本教科書以外，本來不做甚麼研究，在某行學問上不預備生甚麼淨利。他們所以爲學問之敵者，却在他們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聲聲的用教授兩字捧他。

歐美各國大學的學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學生的條件未必如何嚴密，然教授的資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國制度之下，從試教到正教

授，中間要經過十數年或數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美國的制度比較似乎寬些，然而相當的年限也少不得。從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決沒有躡等的，更沒有剛從大學或大學院出來一躍而為教授的。做別的事也許可以不講資格和經驗，學問是積銖累寸的東西，非講不可。中國近來的大學，既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的教授當然比春筍更要多了。然而調查起大多數的履歷起來，最了不得的是剛出大學院的哲博或法博（是J.D.，不是H.L.D.）。我說此話，不是推崇學位，不過得過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過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論文，比較差強人意罷了。

一國各大學的教授，總看起來，是一個不組織的最高學府，所以

當教授的責任與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國的教授，十之七八，既無成績在前，又不亟起直追於後，使當教授之名而無愧；結果，除了一行學問，在這位教授手裏，不得不宣告停頓外，還有一個絕大的危機。就是，使登他「門牆」的人，並不見門牆如何之高，於是學問界倖進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飯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種餬口的職業，中國的學問界就可以宣告破產了。除非有別派健全些的勢力出來替他，這是不可倖免的。這不是危言，近來已很有這種趨勢，前月工會組織發達的時候，不是有人提倡設立一個教授協會麼？當時我願義思名，以爲與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識階級的非難，不如稱爲「課業工會」，與其他工會一致行動，比較妥切

些。這個工會的大目的，當然也在『保護並發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來談學問，工會也許要出來干涉；不入工會的學問家，也許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許在大學裏教書。此種現象，目下雖尙無有，不過若是不講資格和職業化的兩個傾向長此不改，早晚不免有這個日子罷了。

總之，就現在情形而論，中國多一個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學問即多一個障礙，少一分進境：因為他把持了這一學問，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問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國風行一時的教授——是學問的大敵，這是第三個說法。

當此學問衰頹之極，非特普通大學生，即中國社會之知識份子，亦

留學生問題

這幾天報上有上海銀行旅行部『本年遊美男女學生請注意』的廣告。這個廣告，可以引起好幾種不同的心理，因為看這廣告的人也有好幾種。在想留美而經濟能力上可以留美的學生方面，起的是一種心理；在想留美而能力不能留美的，起的又是一種心理；在留過美國已經回來的學生，回憶到當年的生活，有聊無聊，起的更有好幾種心理。在對於留學運動，通盤籌算過的人，較量過利害的人，引起心的理更是不同了，我們來談談最後的一種心理。

我們最先要問的是：年年歲歲有大批留學生出洋，到底有沒有一箇盡期？留學運動本不自今日始，兩晉六朝之際，中國人到印度去求佛學；唐朝年間，日本人到中國來留學；多利亞朝的埃及，有許多希拉羅馬人到亞力山大城去留學；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批的美國人到德國留學，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派許多青年人到歐洲留學。古代文化的國家觀念不深，我們不必論他。美國人的留學，和日本人的留學是有相當的限制的。他們似乎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就教於外國，到相當程度為止；在所求的新學問上可以自立了，便不求別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原則。今日美國各大學的教授，在十五歲以上的，有許多是當初的留德學生，年紀輕些的，却是本國訓練出來

的。日本也有同似的情形。

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似乎不受這種原則的支配。留學生一批一批的出去，很少幾個存心說：我學成歸國之後，希望國內對於這行學問上，可以多一分獨立的力量，少一分繼續送人出去的必要。結果：在留學生——尤其是留美學生——個人方面，造詣很深的委實不多，注重實用的不問學理。習學理的又極膚淺；這種現象觸處可見。在國家一方面，永遠覺得在文化上不能自動，不能不扶而立，在在要仰人鼻息，拾人唾餘。比較實用的人才，如同駕駛人才，及各種工程師，尚須仰給外人；關於純粹科學方面的各種設備，更是顧不到了。我國留學運動，與日本大致同時發軔，但是就成績而論，便不

可同年語了。這是誰的過失？

近來的趨勢更是不健全了。當初的國人不屑出洋留學，後來態度一變，以爲何妨出洋留學，但比較是冒險的。如今態度又變，以出洋爲無上時髦的舉動，所以只要財力上可以應付，甚至勉強可以應付的人，誰都出起洋來。結果，上文所述膚淺，不求深造的弊病，更深了一層。美國文化學者戈登泛塞 (A. A. Goldenweiser) 有一次演講，批評美國人近來喜歡到歐洲遊歷的風氣，說：美國一般膚淺的人，有一種哲學，以爲遊歷便是學問，學問便在遊歷；其實要逃避學問這種惹厭東西，遊歷確是無上的好法子。這一番話，對於最近和今後的留學運動，我看似乎也適用了。

遊歷原是個人的舉動，但留學却不是，留學攸關乎一國文化的大局。故我國政局救平之後，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採取相當的政策，至少也應該規定幾條原則出來。留學生所習的學科應參酌社會的需要；非大學畢業生，非有相當造詣的人，便不許留學；去國之前，回國之後，須加以考績；諸如此類，都無妨明文規定，適用於一切官私費留學生。在社會方面，也負有幾分責任，第一要打破留學生必較非留學生爲有價值的謬誤觀念；引用人才，更不應祇在留學與非留學的分別上用功夫。要知道從國家文化方面看去，不從一己的榮譽方面看去，留學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舉動。要問當此通國要求關稅自主，裁判權自主的時候，何以無人主張文化自主。我國對於近

代世界的學術，不比日本人，始終只知介紹，引用，不知自動發明；對於此種事實，更要引爲通國的奇恥大辱，而這個恥辱的亟宜洗刷，不在其他國恥之後。廢除了以留學爲時髦的心理，再於上述諸端有相當考慮之後，留學運動就自然而然而會有選擇與限制了。

立達學園的旨趣

立達學園是近年來許多私人教育企業裏很值得注意的一箇。察創辦者的懷抱，和他們已得的成績，我們不能不說他們是當世之有人心了。

但是對於立達學園的旨趣，我們似乎不能沒有懷疑。他的旨趣裏有下列的兩段話：

『我們堅信人類生而平等，個個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都應該有機會盡量發展天賦的資能，倘若有人因教育上的缺限，成爲社會進

化的障礙，社會自身應負其責，教養是社會底義務，不是社會底恩惠。我們現在也祇是本良心主張，履行社會底義務。

『我們堅信社會遺傳，經濟狀況及其他環境上的事項影響到文化底歷程，固然很大；但是環境是以人底意志征服和控制的。我們又堅信個人底先天的資稟固然多少已經預定生命程途上的種種傾向，但是這種先天的資稟大部分是可以教育勢力去潛移默化的。』所以改造社會，要根本從改革教育入手。……要注重我們立達底師生對於學問方面，不純是記憶書本知識，要在能講求自由研究，獨立思索，以求養成科學的頭腦。』

『旨趣』內打頭第一句便是『我們堅信人類生而平等』。既然

是『信仰』，我們不能說他不對，同時却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十八世紀的信仰。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也說：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那就淵源更遠，遠不止十八世紀了。這是一點。

『社會遺傳，經濟狀況及其他環境上的事項影響到文化的歷程，固然很大；但是環境是可以人底意志征服和控制的』。這也是他們信條之一。質言之，卽是意志力可以戰勝一切環境的勢力；就是，意志力是萬能的。這一層信仰，也是很古的。孔子說：吾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以善養意志力著稱，他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這又是一點。

『個人底先天的資稟固然多少已經預定生命程途上的種種傾向，但是這種先天的資稟大部分是可以教育勢力去潛移默化的』。這也是他們信仰之一。質言之，便是教育可以勝過遺傳。孟子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說：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當時的君子，便是教育的果，也是教育的因。可見這個信仰也是很古的。這又是一點。

學園名爲『立達』，大概是取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的意思，也是淵源於孔孟之教的。名稱和旨趣既然都是仿古的，如今却有人稱他爲『近代學校』：這如何令人不懷疑呢？

社會進化的大因子不外三個：個人的意志，環境，和生物的遺

傳，這三個因子，在立達學園的旨趣裏，居然一個都沒有遺漏。但是三因子間的輕重，却大有商榷的餘地。據最近的科學事實立論，似乎生物的遺傳是最根本些，其次是文物的環境（教育與社會遺傳在內），又其次是意志；有人且把意志完全撇開不談的，因為據說他是不肯受因果律支配的一種東西。如今立達學園創辦諸君的見解似乎恰恰與此相反。教育可以潛移默化遺傳，教育是環境的一部分，而意志又可以征服和控制環境。意志是何等的偉大呀！

旨趣中的各條既然都是信仰，而且從事之者又信得非常之堅，我輩又何必多責難呢？不過這幾個信條能不能成立，却還是一個問題，嚴格說來，並且有人認為不能成立的。根據了信仰辦教育，根

據了未必健全的信仰辦教育，竊期期以爲不可！

談職業教育

十六年五月八日爲中華職業教育社十週年紀念之期。社友楊衛

玉潘文安二先生爲文述職教育十年來之成績，囑爲披露之於學燈，並囑弁一二言於篇首。

在職業教育聲浪甚囂塵上之今日，鄙見所及，以爲有宜亟切注意者三端焉。請分別言之。

一 職業教育之實際效用

年來國內盛倡種種救國之論，如基督教救國論，國家主義救國

論，地方自治救國論，甚至音樂救國論，不一而足。教育救國之論，較其他救國論之歷史較久，亦較易捉摸；近年來從事之者更各就其見解能力所及，分別倡為平民教育，義務教育，及職業教育救國之論，誠盛事也。

世無百病皆治之良藥；救國事業，當然非一種口號，一種主義，或一種特殊之社會舉措所可獨力驟獲，故以救國二字相號召者，不過極言其重要耳。雖然，倡說者之所謂重要未必即為社會與一般通人之所謂重要也。以教育與其他流行之事業較，教育自最重要。以職業教育與平民義務等教育較，職業教育似更較根本，此先富後教，先倉廩後禮節之說，先民已具言之，不待今日而后知者也。

第言教育普及而不顧受教者之遺傳與環境，不爲之異其種別或程度，與夫施教之方，則其患且甚於教育不普及，此孔子所以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言，而近日竭力提倡平民教育與義務教育者所宜三思者也。雖然，職業教育則異是。中國今日之社會問題，泰半一生計問題也。職業教育家所實授者，不爲空洞無物之智識，而爲切實可靠之技能。普通教育之所賜，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建言立議則不足，亂發意見則有餘，與職業教育較，其實際教育效用不可同日語矣。

二 職業教育與人才教育不宜相混

國內職業教育之初倡，有人疑其將破壞文化者（見同日學燈楊衛

（王先生報告）：是不諒解職業教育者也。治職業教育者大聲疾呼，容有熱度過高之處，然必欲使人人受職業教育，強人人於生計滿足外，不作他求，我敢必其無是主張也。雖然，懷疑者亦未嘗無相當之見地，大學校教育，專以人才教育爲事者也，而號稱大學教育最發達之美國，近且以程度日益低降聞。美國大學之商科及其他職業科每有尾大不掉之勢，報名攻讀者大率志在求狹隘之職業智識，外此於國家文化之大業，不欲問聞，亦無力問聞。大學程度之低降，當然別有原因，而此當爲重要者之一，可無疑義。

此種不幸之教育現象實基於不健全之社會哲學。此哲學曰：一切職業皆屬平等；故研究院出身之教授，與職業學校卒業之工人，二

者同爲社會服務，故其價值相等，不容岐視。既不容岐視，則大學而兼作二種人才之訓育所，於理論無乖，於實際可收經濟之效。此昧於事實之論也。夫二種職業之不宜岐視，固當；然謂其社會價值相等，則大謬；職工之所爲，教授能爲之，而教授之所爲，職工不能爲之，換言之，一國人口之中，可爲教授之原料少，而可爲職工之原料多，多則價值不能不低降，此供求之原理有然，不可強改者也。

我國今日之職業教育，尙未與人才教育相混。然有不能不提防者。組織上相混之結果既如上述。卽不相混，（德國教育之所謂雙軌制），而同時於社會價值觀念不加注意，則有才力之青年，於國家文化有貢獻之可能者，或相率入職業之訓練一途，不更求深造，社

會亦不使之更求深造，則所失不已多乎？

總之，以職業教育為教育之一種，而知其所適合者，雖為人口之一大部分，而非其全部，則前途不患不能有重大之貢獻。如認以為一種教育學說，從而為之鋪張揚厲，以為無往而不適宜，則利將為弊所掩矣。

三 職業教育與中國人口問題

職業教育使人人有生活之技能，宜若可以解決中國今日之人口過剩問題矣。此若然而未盡然之說也。人口問題之一方面為糧食問題，如糧食有限，則雖人人有吃飯之本領，而飯之依然不敷吃如故。工業發達後，生產品日多，利之所入，未嘗不可購多量之糧食入口，

濟本國之不足，然是固有有限而不可久持者也。且從事職業者之生活既較充裕，若輩之生產率將日增，而死亡率日減；人口之過剩或愈甚，其爲問題也或將愈亟；是亦不可不注意者也。

第三中大令小學校勿用古話文

昨天（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報上說，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昨通令各中等學校云：

查本大學區內，所有初級高級各小學，從十六年度第二學期（就是十七年一月），一律不准再用古話文（就是文言文）的教科書或教材，已經由本大學分別通函各市通令各縣轉飭所屬各小學一體遵照，並且呈請大專院核準備案了，現在有兩件事，要教各該校長遵照辦理的，就是，（一）市立縣立區立私立各級小學，既

然從十六年度第二學期起，不准再用古語文的教科書或教材，省立各中學附屬小學和市立縣立私立各中學或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也該一體遵照辦理。（二）本大學區內各級小學，既然不准再用古語文的教科書或教材，從十六年度第二學期起，本大學區內各中學和各中等學校，招生的時候，也一律不准再出古語文的題目，除分令外，着該校長遵照，不得違抗玩忽，此令！

一種文化的行爲而值得用法令來推行，一定是有重要的理由的。但是在不知道發通令以前的原委的人不能沒有懷疑。

第一，古語文和今語文或白語文究竟能不能劃清界限，是一箇疑問。即如這次『不准再用古語文』的通令裏，我們就可以找出幾個

不今不古的，亦文亦白的字眼或名詞來。『通函』，『違抗玩忽』，『飭』，『遵照』當然是文言，不是白話。若說衙門文字，向有格式，不便一律換過，那就有些失提倡白話文的至意了。何以教科書和教材一律須用白話文，而通令中却穿插着不少不白話的字？這一段話的目的決不在吹毛求疵，不過要指出『古話』和『今話』是不能絕對劃分的。在歷史裏講時代，『古』『今』又何嘗可以絕對畫分呢？要提倡不能劃分清楚的事物，而出之以通令的方法，似乎有些不大妥當，也怕不能有多大的效果。

第二，通令裏指明『初級高級各小學』；可見中學和中學以上的學校是可以上古話文的。這裏我們又不能不生疑問了。小學和中

學原是一箇歷程的兩箇段落，名稱雖分中小，程度却是漸進的。這次的通令似乎根本違反了此種漸進的原則。將來實施之後，大多數的小學升學生不免要感覺到文字上的困難，這是顯而易見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發見一箇小小的矛盾。如承認古語文和白語文有根本不相同之處，值得通令禁止，那末發通令的教育長官應當顧慮到：一箇升學的小學生豈不是要感受到差不多像再學一種語言似的困苦？反之，如承認古語文和白語文沒有多大分別，一箇升學的小學生決不會感受困難，那末，我們就不能不根本懷疑這一種通令的用處和必要了。

聽說劉大白先生對於這段評論當時有過一節答覆的文字，登在不知那一箇報上，後來又在他的白屋文話裏重印過一次。可惜我都沒有看見。看見不看見，沒有多大關係，反正我是不喜歡和人辯論的。有理由無理由，自有讀者公論。

光旦附識。

大學與體育

滑稽影片大家羅克演過一張影片，叫做『大學一年級生』(Harold Lloyd, Freshmen)，在上海也映過好幾次。這張片子的性質，看官們如以為完全是滑稽的，那就等於白看了。它實在有很深長的諷刺的意味。諷刺的是：美國大學裏體育的畸形發展。

這諷刺的意味，羅克在片首開宗明義時便明白的指了出來。看官們也許還記得，開幕的第一景似乎便是某大學校的全景或鳥瞰，他的說明是：A big stadium with a college attached to it. (譯文是：一

個大賽球場附帶着一個『大』學校。譯又不能把原文的精神完全達出來，今將大學校的大字放在引號裏，似乎好些。

自來體育的發達，不外取兩種方式：一是個人的，以健康為唯一的標準；一是團體的，健康之外，又可以得到合作的訓練。不過這兩種方式都包含第三種方式的可能性：就是競賽，尤其是團體的體育活動。競賽的傾向本來很自然的，不過要是太偏重競賽，結果可以把體育的最大目的——健康——反而忽略過去。學校裏的體育活動，要是太注重競賽，結果更是不利，因為除了大多數的學生得不到健康的增進外，還有兩個大弊病。一是荒棄學業。二是在學生中間養成一個特別階級。

我國的大學體育，學步美國，已很有偏重競賽的傾向。在設備

比較完全的絕少數大學裏，有特別建築的健身房或體育館，並且組織有體育班，大多數的學生並不因學校注重競賽政策而失却鍛鍊個人身體的機會，但是其餘兩個弊病是免不了的。少數的學生，所謂『運動家』的，因為競賽前的訓練，競時賽的賣力，競賽後的休養，功課上在勢不能全神貫注，是不言而喻的；即其他學生，因為要當看客，要臨場歡呼，要加入『拉拉隊』，否則不足以壯隊員的士氣而揚母校的聲威，有時便自動脫課，有時請求學校停課一二小時，或竟休假一日半日。如若凱旋歸來，那請求放假的理由，更是充分。這種因為校際競賽而休學的行爲，一學期內來不上幾次，已可以使這學期的功

課上氣不接下氣了，何況事實上竟有壓壓爲之的呢。十餘年前上海某大學校，因爲招徠運動員，竟有私下向此等人運動，請其進校而絲毫不加以學問上的甄別的。這種學校行政與學業標準上的自暴自棄，真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

所謂養成特殊階級的一端，也有重要的證據。當隊員的學生，既爲全校聲威所繫，便不免自大起來；學校方面，也不免特別奉承他，功課上的優容放任，不用說了，在物質生活上也要佔許多便宜。有幾個大學竟有『訓練桌』的設備，預備了特別精緻的飯食讓隊員們享用。一般浮淺的同學們又以得結交運動隊員爲榮。諸如此類的情形，可以根本影響到校風的健全。

總之，學校應當注重體育，但要明白體育在大學裏，畢竟是一個賓，是一個末。要是注重過度，弄得本末倒置，喧賓奪主，那就不相宜了。

科學研究與科學提倡

『科學研究』與『科學提倡』是完全兩件事，但是我們中國人似乎分不十分清楚。這兩件事是有先後的，提倡時期在前，實地研究時期在後，但是我們中國人講究了二三十年的科學，到如今似乎還在第一時期之內，還是始終在那裏提倡。

最近吳稚暉先生的全集出版了。翻看他的總目，第一集便是堂而皇之的『科學』；但是仔細看去，十多篇的文字裏，一部分是有提倡性質的，其餘連提倡的意味都不很明顯，和實地研究更是不相干

了。然而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裏，這都是科學文字，凡做科學文字的人，不妨奉以爲圭臬。

大約三十年前，英國生物科學家『天演論』的著者赫胥黎讓他的全集公布於世。這部全集實在有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赫氏的通俗論文，演講的底稿，與在生物科學以外的研究錄；合訂成九大冊，是Appleton公司出版的，總名爲赫氏論文集。第二部分是赫氏生物科學研究的成績，是赫氏一生用了積銖累寸的功夫得來的；每一篇有一篇的特殊貢獻，在科學史上有永久的價值的；這一部分合訂成四厚冊，歸Macmillan公司出版。如其把這兩部分的內容比較一下，可知在第一部分裏的文章，不論他包含多少科學的材料，終究只好放在

第一部分裏，在第二部分裏是完全沒有位置的。爲甚麼？因爲他只有提倡性質，而沒有研究性質。

見了吳老先生全集的目錄，因而聯想到赫胥黎的全集，因而引起一番比較。這並不是對吳老先生，有甚批評；吳老先生雖很難說是一個科學家，但是他有他的學術上的貢獻，我們不能小覷。不過編書的人把他一部分的文墨歸併起來，貿貿然冠以科學二字，很足以表出我們中國人分不清楚科學研究和科學提倡的迷糊心理罷了。

中國的科學沒有跳出提倡時期，並且沒有把提倡和研究分清楚；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據。這個證據可以在中國科學社的組織裏見到。科學社裏的領袖人物，都是有相當能力的，那決沒有問題；但是中間

有幾位領袖，無論他學問如何淹博，能力如何廣大，却似乎與科學二字不能發生多大關係，或者從前發生過關係，如今事過景遷，這種關係就很難維持了。

歐美各國科學組織的領袖，十九是在科學研究上，不論那一方面，有過多量的成績的。他們有了研究的成績，出來發提倡的議論，自然不怕沒有良好的影響。但是中國人的提倡科學，就是許多科學社裏出來的人物，怕不免始終在那裏隔着靴兒搔癢。隔靴搔癢式的科學提倡，如何可以使中國的科學事業脫離提倡時期而進入實地研究時期呢？

總之，科學原無須乎特別的提倡，至少，科學提倡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作業，也不是一張嘴，一支筆可以做得到的。給有志於研究

的人一個生存的機會，把他們的成績獎勵起來，他們的人格推崇起來，這提倡的至意便寓於其間了。

中國人與國故學

照現在的趨勢看去，中國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國已往的文物起來，也許要到外國去才行。現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國去不可；將來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國去不可。現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經很可憐，將來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憐咧！

這決不是聳動觀聽的危言。有兩種強有力的證據。一是外國研究中國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績一天精似一天；同時中國人自己作這種研究的人並不見得加多，並且精到的程度未見得

能超過外國人，有時竟不如他們。二是中國的古物，比較值錢一些，幾十年來，不斷的向外國輸送，近來輸出的數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顯著。古物一到了外國，外國人確能利用他們，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來闡明中國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東西既給他們搬運了去，老師的身分又讓他們佔了去；將來我們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學問則已，否則怎樣能不就教於外國的支那通先生們呢？

江南有句俗話，因人成事叫做『向人家手裏討鍼線』；現在國故學的趨勢，似乎要向人家手裏討自己的鍼線了。這種向人討自己鍼線的文化功夫，近來已經是數見不鮮。最近從德國譯回來（『譯回』的名詞是我杜撰的，不過怕以後很有希望可以通用！）的甚麼『左傳

真偽考』，便是一個好例證。從東瀛『譯回』來的書本，何止數十百種，我們早就司空見慣了。

然而這還是請人家來遷就我；我們把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成績譯回到中國來，安知不是專供我們批評之用的呢！這也許是的。冠冕話儘可以怎樣說，但是移檯就教的日子怕已經在目前了。前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教授 Carter 死了，繼任的是向負盛名的一位法國支那通 Pa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為慕他的名，許多中國學生就選了他的課。他第一天上課，便突如其來的發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讀。這篇碑文裏很有幾個生字，並且駢儷的體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難倒了；

他們很費了一些躊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後來留學生們開會，特請 Pelliot 來演講，主席某君致介紹辭，開口便說『中國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 上臺，開口便把主席的話駁斥了一番。中國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暫且不問他，不過一把斧頭決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況在『班門』之前呢？這位 Pelliot 不是別人，燉煌石室的藏經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

中國好比一個敗落的世家，外國是幾個暴發的富戶。彼此毗鄰而居，不上幾年，世家的遺物不知不覺的都落到富戶手裏去了；富家子弟得到了這種遺物，也不免打動了研究的興趣，結果反足以在世家的子弟前面，炫耀他的博學。這都是很自然的。不過，近來這

個世家似乎有力圖自拔，重振家聲的欲望與決心。前有所謂國家主義，今有所謂民族主義，無非是這種欲望與決心的一個表現。但祇有決心是不够的，同時要有具體的方法。

誰都知道這種方法之一，便是舊文物的保留和研究舊文物的提倡了。世家的家主要子弟們爭氣，第一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列祖列宗做過甚麼事業，有過甚麼貢獻；祖宗的作爲，子孫的無用，兩相比較，一定可以引起子孫輩的自奮。否則日呼千百篇的『爭氣』，也是徒然的。

在民族主義或是國家主義的呼聲中，我希望國人對於國粹之保存國故之研究，有一番新作爲。庶幾前途向人家手裏討自己鍼線的難

堪勾當，也許可以倖免了。

……

……

普及識字？

教育不就是識字，至少，不祇是識字。普及教育的工作絕對不是教人人認識幾百個或幾千個字就算了結的。這是從事教育事業的人早就了解的。不過近來所謂『平教』或『義教』的設施，似乎完全在識字上用功夫。『平民千字課』一類的教材，便是這種功夫的一部分。講教育，不能不先從識字下手，這似乎是當然的也是必然的。不過若是普教工作只做到識字程度為止；接着沒有下文，那便大大的可慮了。

教育是近代社會進步的一大條件，是無可懷疑的。但祇是識字的傳授，算不了一個大條件。他有他的利益，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弊病。文字原是一種工具，並且是一種銳利的工具，要是用非其當，非徒無益，且有大害。對於社會如此，對於個人也是如此。

普通德謨克拉西政治下的社會知識生活往往發生許多不健全的現象；最顯著的一端是下等讀物的充斥。一種讀物，雖無價值，而銷場未嘗不暢旺，便足證識字教育逐漸普及或已經普及的效果。識字教育可以教人讀書，讀不費腦力的書，但並不能教他讀那一種書才相宜；換言之，沒有把辨別價值的原則，選擇的原則，同時傳授給他。普通一個人的行爲是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徑走的，同時又有外界的勢

方引誘他上這條路；一推一挽，社會的知識生活又安能不江河日下呢？

在社會生活比較有標準的地方，一般人的讀物，雖無價值，但尚不至於絕對有害。例如美國，這種讀物中百讀不厭的題目，無非教人如何成功，如何訓練記憶力，如何可以談吐生風，在交際場中不與向隅之歎；諸如此類，至多多騙幾個熱中的人罷了。在社會生活沒有相當標準的地方，這種讀物的內容就不堪問了。姦，盜，邪，淫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引起人們卑劣的衝動事物，不論真假虛實，都可以搜括來做材料，這便是目下中國社會裏怪現象的一端，我們隨時可以目覩的。數年前盛極一時的黑幕小說，近來層出不窮的『新智識，

文化』都可以證明在今日的普教政策之下，識字的人一天多一天，讀物的標準就要一天低一天了。

在政治比較清明民生比較充裕的社會裏，又例如今日的美國，無聊的讀物雖多，影響雖大，但決不至於牽動社會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會裏，各種不健全的『信仰』『學說』或『主義』可以乘虛而入；不逞之徒把他們傳授給許多只識字而不識利害的人們，例如今日各種主義之於一般工人農民，其影響的惡劣，不言而喻了。

從這一類的社會現狀看去，可知『識字』和『識利害』不是一件事，也不一定有因果關係的。一個人識了字，能讀普通的書，未必

定識利害，識取舍。識去就。利害，取舍，去就的道理的獲得，一半靠一個人的智力，一半也靠長時期的訓練。目下從事於教育普及事業的人並不承認平民教育只須做到讀書識字爲止；但若是他們以爲只要多識幾個字，一個人便可以懂得是非利害，社會問題就可以從此解決泰半，一個民族的文化就可以提高幾寸，那就太樂觀了。美國社會裏的無聊讀物，大學生購閱的爭先恐後，並不比一般人爲少，這是有人做過統計的調查的。

根據了『識字便可明理』的信仰去辦『平教』或『義教』，結果不過替目下流行的種種小報，種種甚囂塵上的『性』的讀物，多培植幾個主顧；多替野心家擴大一些宣傳蠱惑的領域罷了。

近來除了『平教』和『義教』運動之外，各地又有『識字運動』的舉行。一樣是普及識字，這種新運動却是名實相孚了！不圖過了三年，這一篇討論的價值，不但沒有減少，並且增加了些。『不幸而言中』，乃有如此者！

光旦補識。

釋『讀書不忘政治』

在今日的中國，學生與政治的關係應該如何，確是一個大問題。十餘年來，幾經討論，還沒有解決。似乎蔡子民先生說過：『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這種兼容並納的意思是很好的；但『不忘』二字，究竟不忘到何種程度，蔡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從實地的加入革命工作起，到每天涉獵重要的政治消息止，這中間種種程度，有那一種可以算做『忘』了政治的？所以仔細看去，這一種的話聽上去雖覺順耳，但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似乎並沒有幫助。

這『不忘』二字，也許早就有了公認的註解的。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許多人的意見雖未必以為個個學生應當加入實際的政治活動，才算得『不忘』政治；但若是在求學時代，大家祇做到看報或關心政治消息的程度，他們又覺得不夠了。

向來講政治改革的人，總以為加入的人越多，改革事業的成就便越有希望；甚至捨了亞力士多德的牙慧，製為『人人是政治動物』的標語來勸勉人加入改革事業。但如今看來，這種觀念似乎是錯的。我們不妨提出一個不尋常的問案來：安知近來中國政治的紊亂，不因為作實際政治活動的人太多了呢？也太雜了呢？

這個問案，不特不尋常，並且有人要當他是胡言亂語。不過我

們提出他來，也不無些少理由。十多年來，加入政治活動人雖一天比一天多，但改革事業並一天比一天良好；這是有目共覩，無待諱言的。有人說，這因為加入的人還嫌不多，所謂全民政治或全民革命本來是指望着人人參與的。這話也許很對。不過我們接着不能不懷疑的是：若是每個農民，工人，商賈，及其他本在謀生而有職業的人，都拋棄了職業來營所謂政治工作，姑不問政治工作的成功如何，社會上固有的安全和秩序，怕就先要受重大的打擊了。要知政治外的業務大都和生計問題有密切關係，政治工作也是一種業務，但在理論上，他和民生計的關係，是很間接的；政治可以調節種種生利的業務，但本身不是直接生利的。（中國政治工作的職業化和生計

化，本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如今有許多人脫離了職業，不再直接爲社會生利，却悉數的往不生利的一條途徑去活動，社會治安又安能不發生問題呢？

有人說，這種社會生活上的紛擾是暫時的，過渡的；有一天，因爲這許多人的出力，政治可以清明了，政治的力量就可以把種種職業的身分重新奠定起來。但有了這許多人出力之後，政治究竟能否清明，我們還不能沒有懷疑。從別種業務轉到政治工作的人，也許根本不宜於政治工作。對於政治改革事業，他可以有十分熱誠，十分趣味，但未必有一二分真實的能力。這種能力，我們即自因推果言之，也不能決定人人都有，何況二十年來個別心理學的成績早就證明

給我們看：不論何種能力，在人羣中的支配是作有規則的等差的呢？如今不論一人政治工作能力的有無多寡，却勉強他，或容任他，做政治工作，而所勉強或容任的又何止一二人，結果的不能良好，便可想而知了。有句俗話說：老大多了要翻海船。大家都是老大，海船還不免於傾覆，何況不都是老大呢？

總之，政治工作在乎得人，而不在于人多，并且似乎根本不宜乎人多，因為有政治才能的決不會很多。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而竭力主張專家政治，也許便是此意。實際的政治工作應該託付給這種專家去做，一般人只居督察和進退他們的地位。

上文種種是為一般有生計業務的人說的。為學生呢？我覺得

這一番話也未嘗不適用，並且似乎適用得還要密切些。已有職業的人，在生活上多少已有些預備，觀感上，多少已有幾分成熟；所以他們對於政治事業，不妨有些表見。但是對於尚在預備時期和培植時期的學生，社會不宜責成他們太深，只須指望他們對於當代的政治狀況，能加以比較精密的觀察；學生們自己，也人人應當以精密的觀察者自期，因為我們雖不都是『政治動物』，我們却都是政治社會的一分子，多少是憂戚相關的。讀書不忘政治，『不忘』二字，應作如是解釋。

作實際政治活動的人減少起來，作細密觀察的人加多起來，同時安於其業務——學業也是一種——的人也加多起來，我們的政治問題

也許可以略見鬆動。十年來鬧得很熱烈的，其實不全是政治問題，一半是政治上『人才』擠擠（通濟濟！），透不過氣來的問題；位置的不夠支配，也是一個問題，但還算是次要的。

政治現狀中學生界之淘汰與選擇

前幾天和人家談話，有人問起今年各大學學生對於政治的興趣如何；當時在座的有好幾個大學的同學，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似乎不及往年濃厚。爲甚麼？今年的政治狀況根本不能引起學生們的興趣麼？今年的學生對於政治問題，根本換了態度，對於愛國的熱誠，根本減少了麼？都不是。最或然的原因，依我看來，是一年以來學生界經驗過一番重大的選擇和淘汰。這種選擇和淘汰的作用，是一向有的，不過這一年以來的比較特別顯著些罷了。

我在上文『釋「讀書不忘政治」』裏說過，人們對於政治工作的興趣和能力是不一律的。惟其不一律，選擇和淘汰的作用便可以發生。大凡一個學校裏總有三種人。第一是有政治幹才而兼有政治工作的興趣的人，既有幹才，當然就容易有興趣；對於這種人，外界的政治狀況自然最容易發生影響，甚或把他們吸引出來做實地工作的分子。第二是祇有興會而未必定有相當幹才的人，這種人也很容易受政治生活的誘引。第三是既無幹才又少興趣的人；這種人不容易受誘引。在第一第二兩種裏又可支分為二派：一是有幹才，有興趣，而同時理解力比較發達，喜歡有了細密的觀察和研究後再下手做實地工作的；有的性情比較躁急，蒿目時艱，等不得觀察或研究就要

動手的。政治狀況對於這兩派的影響，當然又有不同，對於第二派的誘引力要比對於第一派強些。

在學校裏，本來這幾種幾派的人都有；但假如外界政治潮流一發生變動，例加這一年國內的情形，這種成分上的複雜程度就要降低；許多人加入政務工作或黨務工作的結果，學生界的成分便比以前要清一色些。這種成分上的變遷，如就存留在學校裏的分子說，叫做選擇，如就脫離學校的分子說，叫做淘汰。在政務或黨務方面，吸引到的工作分子是受過選擇作用的。最近大學學生對於政治現狀的興趣較前冷淡，根本因為許多興趣濃厚的人已經脫離了學校，而存留下來的却是興趣薄弱或有相當興趣而偏重研究和理論方面的人。

這種淘汰和選擇作用的利弊如何，我們不妨繼續討論。這有兩種看法。如就目前計算，似乎很有利益。在政務黨務工作方面，得到許多富有血氣富有情緒的青年，可以增進工作的能率，是無可懷疑的。在學校方面，安心向學的學生比以前要相對的加多，學校行政可以比較順利，學業的進步也比較要有把握。

但若眼光放遠一些再看，目前的利益也許就是將來的禍根。

最顯而易見的壞處，就是『學』『用』二事，根本脫離了干繫。

上文論的幾種人裏，第一種對於政治有幹才有興趣的人，因為亟於實地工作，便得不到充分的學理上的培植。第三種，在政治方面才幹平庸與會淺薄，因而未脫離學校的人，反而要徇了章程的要求，在政

治，經濟，社會學等科目上用許多功夫。於是實行的自實行，理論的自理論，各不相顧；十年之後，要覓真正的政治人才——即天賦和培植都很充分的政治人才——怕就等於鳳毛麟角了。

不但如此。上文論的幾種人裏，不還有第二種對於政治工作祇有興趣而未必有相當幹才的人麼？這一種人引起的問題不止一箇。第一，就是他們人數極多。在政治已上軌道的社會裏，這種人不會很多。但在我們中國，一面有做官的舊慾望，一面有人人宜參加政治的新理想，一面又有未上軌道的實際政治；結果，本來對於政治業務沒有多大才具也沒有多大興會的人，也都引起了『從政』的思想；結果，政治業務裏也就發生了供過於求應接不暇的弊病。第二，只

有興會而未必有才幹的人辦政治工作，決不會有多大的成績，甚或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是很顯而易見的。第三，有才幹做烘託的興會是可以持久的，但是沒有烘託的興會，橫逆之來，可以完全消失；興會既去，這種人要是不能脫離政治生活，便害政治，因為他們是敷衍的；要是轉入他種業務，便害他種業務，因為他當初既半途脫離了學問生活，對於任何事業，自然不會有相當的訓練。總之，他在社會經濟裏，是比較順應失當的分子；在今日的社會裏這種人已經不少。

前途要免除這種弊病，只有不鼓勵上文所述的選擇和淘汰作用。換言之，即不論對於政治作業有多少才幹，多少興趣，總以先事觀察研究而不亟於實地動手為宜。選擇的作用非不可有，但應當於學校

範圍以內行之，即，學校對於政治興會特別濃厚的學生，應給他們一些特殊的機會和設備，來研究和觀察當代的政治狀況。

生物科學的新價值與大學課程

歷來我們討論到的生物科學的價值，往往不出兩點。一是思考方法上的訓練。二是自然知識的增加。七十餘年前（一八五四）赫胥黎對於這兩點早就有過詳細的討論。（*On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ciences*，赫氏論文集，第三冊。）

這兩種價值，初看去似乎很抽象的。其實不然。思考方法的訓練，要是得當，是可以活用的。一個人日常的生活裏，待人，接物，處事，都可以得到這種訓練的幫助。一個人能不惑於耳食之

言，能不受成見的蒙蔽，能就事論事，不逆臆，不武斷，要熟權輕重之後，才出主張，才定計畫，便是方法活用的結果了。自然知識的增進也不是徒然的。就其普通些的效用說，對於一人健康的保護，對於天然美的領略，生物學的知識便可以做先容。就其專門些的效用說，醫學事業，公共衛生事業，和森林，農藝，畜牧等種種設施，又無一不以生物科學做基礎。這種種實際的效用，自赫胥黎到今日，六七十年來，陸續有人討論過，並且已經大家公認。因為受了大家公認，生物科學在當代的教育制度裏，才有了相當的位置。

但六七十年來，生物科學的發展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內容既已增加了許多，他的價值在勢自不能和以前一樣。以前的價值不是抽象

的與教育的，便是實用的和經濟的。如今新發生的價值，可以說是社會的與人文的。

生物科學的門類很多，不論那一門都和社會生活有直接的關係。生物學既屬生命的科學，自不能不與人類生活的藝術發生因果關係，這是無庸說得的。但許多門類裏，和社會生活與人文進步關繫最密切的，要算是遺傳學和心理學了。

早年的心理學本來是和哲學分不清楚的，所用的方法可以說完全是內省方法。到得一八六六年以後摩茲萊 (Maudsley) 一班學者才認定心理學不能不以生理學做基礎；從此，可以說，心理學才成了生物科學的一門。心理學利用生理方法的初期裏，大部分的功夫用

在感覺的試驗上，在實際生活上不發生多大影響。但在今日，心理學的派別裏至少有兩派和社會生活有極密切的關係，前途的可能性正是未可限量。一是從生物變異原則裏推出來的變異心理學，或稱個別心理學。二是從動物心理學化出來的行爲心理學。變異心理學最顯著的成績是智力及其他心理能力的測驗方法。社會人士對於心理測驗的態度，毀譽雖不一致，但是他的社會效用，確是一天增進一天；社會凡遇有選擇人才的行爲時，就不能不利用他。行爲心理學的效用大率將在倫理方面表現，在人才的養成方面，也許也有貢獻。

華會 (J. B. Watson) 有一次在他的演講裏說：把一個普通出世未久的嬰孩交給他，他可以利用交替反射的原則，使他成爲一個天才，不

論何種天才都行。這雖有些大言不慚，但是利用了交替反射的原則來影響行爲，我們可以有不少的成績，是可以無疑的。

遺傳是天演的一種方法，所以演化論發達後，遺傳學的發達自很自然的。遺傳學研究的初期，便把在社會生活裏的人類做了對象。

一八六九年戈爾登作了一本遺傳的天才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便指出遺傳和社會治亂，國家興替，文物消長的密切關係，自此以後這一類的研究成績，便不斷的出來，我要有篇幅，可以列舉幾十種，還不免有遺漏的。最近天才心理研究的熱鬧，又可以證明這兩門和社會生活最有關係的生物科學——心理學與遺傳學——已經是攜手了。行爲心理派和變異心理派在學理上似乎有重大的衝突，但這是

教授們『文人相輕』的故事，是『教授爲學問敵人說』的一個實例，和我們無干；他們對於社會生活各有貢獻，却是真的。

這種生物科學的新價值，似乎今日講教育的人還沒有明白領悟。普通生物學，在許多大學裏，還沒有成爲必修科，可以爲證。生物科學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若有一天受大家的公認，我敢預測，不特普通生物學將爲大學生的必修科，就是心理學和遺傳學也要放在必修科目裏，和現在的公民學一樣。美國有幾個大學已經把演化論列爲必修科，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了。

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

前幾天的教育界紀事裏說，廣西梧州將有一個大學出現；這個大學將有許多優點，其一便是教授的薪金要比現在國內各大學所定的爲高。這段消息引起了我想提出討論而沒有機會提出的教授待遇問題。

大學校聘請教授，有一個很普通的原則，便是一個『專』字。凡是在某行學問上有專長的，便有被聘請當教授的資格。這個原則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學方面，待遇起教授來，也應當有一個單簡的

原則，也便是一個『專』字。凡是能專誠待遇教授的大學，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們的信任和努力。

待遇專誠，專誠二字，似乎應當加以解釋。薪金之充實，如廣西大學籌備人云云，的確是很重要的一端，但決不是專誠待遇的全部意義。最重要的是使教授們得到精神上的謐靜。教授的任務，一半在教導學生，一半也在他的專門學問上繼續用工夫，更求造詣的精到，而研究工夫的第一條件便是生活寧靜。所謂教導學生，並不專指在課堂上若干小時的知識傳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學問的方法，大之如持躬處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價值；質言之，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極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

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甯靜，因爲不甯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

今日中國的大學教授十有九個得不到精神上的甯靜。此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各學校只知聘任專門人才，而並不給他們專誠的待遇。近來兼任講師制的發達，便是不專誠待遇的一種有組織的表示了。一個大學裏面或有幾位是專任教授，但大多數是只擔任少數零星鐘點的講師。講師制的所以發達，一部分由於學校經費不充裕，一部分也由於吃教書飯的人很多，但一部分却由於近代中國教育界的一種特殊心理，我無以名之，姑名之曰『識荊和登龍』的心理。有一位在學問界已有名望的人於此，各大學自然爭相延致，但是這種有

名望的人在中間還不多，並且他所擅長的又不是分身術，結果，祇得讓各學校把他碾成數塊，各嘗一瓣。這種豆剖瓜分式的教授的生活是決不會謐靜的。從甲大學到乙大學，從乙大學到丙……，只點得幾個卯，已感受到疲於奔命的痛苦，遑言留出時間和精神來做學問。在學生方面，只有在上課時間內和教授有些少接觸，他們儘可以向人誇口，說是某人某人的高足，但實惠是畢竟有限的。學校和個人的經濟問題，是一時無法解決的；但是這種徒重虛名而不計實際的心理是可以祛除的。

照現在的傾向，大學教學生活一定要日趨機械化；人格的意味要日趨減少。一個兼任的教授，擔任一兩門同樣的功課，東也講一

次，西也講一次，講一次算幾塊錢，講完了就走；這種把戲，試問與唱『話匣子』有何分別，與江湖賣藝唱道情有何分別。

不過名教授總不能和名角或明星相提並論。他們一樣可以叫座，是真的。但我們對於後者的關繫，除捧角者不計外；不過是短時期的欣賞；對於前者的關係却是長時期的領悟和取法；師生的關係，是應當沒世不忘的。照現在大學校為學生擇師的方法做去，不把一切學問者當做暫時的欣賞物不止。

年羹堯有一次聘請一位塾師，定下的一個合同是一副八字對聯，上聯是『怠慢先生，天誅地滅』，下聯是『誤人子弟，男盜女娼』。教授既沒有專門學問，教書又不專心，便犯了下聯的戒；學教對於教

授不能專誠待遇，薪金上算得『鬼良心也沒有座位』，便犯了上聯的戒。今日流行的兼任講師制多少是犯了這兩條戒的結果！

青年的煩悶

『青年的煩悶』，『青春的悲哀』，『少年的煩惱』……是近年來文藝界數見不鮮的仿語。並且有好幾件文藝的作品採用這種仿語做題目的。

青年有多量的心理上的不謐靜，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這種不寧靜的原因不外兩種，第一是因生理的變遷而起的，第二是因順應社會的意識環境而起的。春機發動期內，和發動期後四五年內，一個少年人的生理作用上要經過一番重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重心之一便

是性慾的衝動。在未開化或半開化的社會生活裏，青年人的性慾，經過短時期的磨難後，便可以因早婚的制度而滿足。但是在文化大開的社會生活裏，性慾的表現到處要遇見障礙，非要經過長時期的耽擱，不能得到相當的滿足。這便是青年煩悶的一大原因。

青年時期，是識見將成熟未成熟的時期。未成熟時，到處捉摸不定，而外界刺激却一天多似一天，非教他捉摸不可，這又是煩悶的一大原因。將成熟時，自己有了相當見地，對於已往的成說制度，便不由得不懷疑，不評論，而懷疑評論之際，又不能毫無顧忌，於是心理上的不寧靜又不得免了。西方宗教的社會裏，一人生產時既受了洗禮，到成年前後又須經過一種禮節，來確實證明他的信仰，叫做

Confirmation，目的便在消弭這種心理上的不寧靖。

中國今日的青年，還有一種特殊的困難，為以前的青年或他國的青年所少有的。近年來不有許多哲學家提倡所謂人生觀麼？他們的見解似乎是，一個人若不先把人生觀確定，便一步不可行。有許多青年人受了這種暗示，便竭力的在暗中摸索；摸索不到的結果，又添上一層煩悶。

青年人確有煩悶。我們的問題不在為什麼有煩悶，却在如何能免除這種煩悶，超脫這種煩悶。摸索不到人生觀的煩悶，是比較容易解免的。感受這種煩悶的人受哲學家的暗示太深了；他們忘却了獲得人生觀的正當的途徑。他們若是對於自然界的事實，對於社會

生活的事實，先有了相當的了解，所謂宇宙觀與人生觀便不求而自得。如今不先求知識的充實，却先要尋一個總括的結論——人生觀，無怪其遍尋不見而徒多自擾了。

識見成熟時期內一般的心理不寧靜，也惟有用『注意實際』這條原則來應付他。遇有不愜意的事物，決不應輕易放過，應清楚的體認，詳細的推尋原委，積極的求一個解決方法。近來許多青年人，似乎並不如此用功夫。他們耐不得絲毫實際生活的繁瑣。有的便專在想像方面去尋生活，結果：未嘗不可構成一座宏中肆外的空中樓閣——理想，來慰藉自己，來解除自己的煩悶。想像力次一些的，便在他人的空中樓閣上討一些氣息：他們很喜歡看淺薄的浪漫派的文

藝，把自我影射到這種作品裏去，和作品裏的英雄美人混化。結果，也未嘗不可以得到些少的慰藉。但是，這種『反求諸己』的解決方法是根本不健全的；擴而充之，便是幾種癡狂的重要症候。

一個青年若是真正能在實際生活上努力；如在身體的鍛鍊，智識的探求，人我的相與，各方面上，都能不懈怠的努力，結果：性慾的潛流也可以獲得相當假借的宣洩。這種宣洩叫做昇華。

一言以蔽之。生活而能積極，能注重實在，青年時代的煩悶便是使人努力引人入勝的一個關口，要不然，便是消磨志氣的一個圈套，一個陷阱。

假期與知識生活的解放

學問沒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長時期的間斷。學校的暑假寒假，少則一月，多則三月，難道辦教育和創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這一個月或三個月之內完全停止學問工作麼？我恐未必。

平日學校裏的學問工作，尤其是今日中國學校裏的，不論他如何認真，如何周密，總不免有一大缺點，就是太注重講義或課本，而學生太少自動研究的機會。中等以下的學校，不必論了，就是大學校裏，也可以說講義和課本之外，沒有別的知识活動的園地。——一種課

本，少則讀半年，多則讀一年，上課自修，無一刻不在字裏行間尋生活。能夠仔細尋去而不囫圇吞棗的，已算是好的了。

求知的的方法不一，最上的是和事實直接接觸，重在實驗。其次把前人求知的結果，加以歸納和綜合，或進而加以評論，重在參考。最下的是把別人綜合過的現存貨來享用，重在專讀一書——叫做課本。講義是未成熟的課本。重實驗，要有設備完密的試驗室；重參考，要有搜羅宏富的圖書館。但是，普通的大學對於這兩方面都沒有相當的預備；既然沒有，知識生活的重心便自然而然的墜到課本和講義上去了。

在學生方面，夜以繼日的在課本和講義裏過活，此中單調的痛

苦，我以為比以前磨穿鐵硯學做八股文還要難受。八股文裏用的材料，很是呆板，呆板的程度要在課本材料之上；但是做起八股文來的鉤心鬥角，據有經驗的前輩們說，却是很能引人入勝的。近來心理學家說，八股文的性質近乎智力測驗，而不是教育測驗，似乎可以證明他確有多量磨鍊智力的功用。

從學生個人的心理方面說，課本與講義生活最大的痛苦，在求知而得不到相當的自由或自動。讀一本書，教員今日指定十頁，明日指定十頁，寒來暑往，總是這副局面，絲毫不用你自己出主意；這是何等不自在的事。一樣一本書，自修是一種意味，當課本讀，又是一種意味，意味程度的不同，便緣自動程度的不同而差。這是大學

生很普通——但是不常有人提說——的一種經驗。

假期，如此看來，便是知識飢荒者解除痛苦回復自由的上好機會，在假期裏，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員的學生。我要用比較高明一些的追求方法，也由得我；即使選讀前人綜合過的現存貨，也是我自動選讀的，也不妨自勵的一氣讀完。

和事實直接接觸的求知方法，在假期內，至少可以適用於自然歷史的研究和天然美的欣賞。不妨利用兩三個月的光陰來作有目的的遠足，而從事於地質的觀察或生物標本的採集。在社會知識方面，社會調查自非一人的能力所可辦到，可以不論。但也有幾條小路可走。認定了一個小題目，多參考幾本書，做一番綜合的觀察，便是

一法。這在有圖書館的大都市中，例如北平上海，是不難做到的。檢出一兩種帶有數量的記載的舊刊物，而用單簡的統計法加以歸納，也是一法，例如前清的繙紳錄，可以說是一無用處的了，但約略加上一些功夫，便可以知道某時期內中國吏才的地理分布；或更進而探求所以有某種分布的原因：結果，也許可以得到一兩個很有趣味的人文地理的結論。還有一條路：認定一個比較健全的觀點，來評較古人的著作——如今很有些學生在做這種功夫；不過這條路比較不容易走，除非你充分了解古人的背景，便難免不說出不諒的話來，難免不犯所謂以今度古的弊病。

學問與潮流

近來常聽人說潮流兩個字，也常聽人說順應潮流四個字。尤其是在思想界裏，好像真有一派浩浩湯湯的一種東西在那裏走動似的。究竟有沒有，我們不去斷定他。我們要考虑的是：假如我們真在一種潮流之內，我們在學問界討生活的人——應當如何對付。

假如你觀察山澗裏一派激流的水，除了你感歎『逝者如斯夫！』之外，你也可以見到澗內種種東西應付水流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樹葉，草根，落花，是完全跟水走的，可以算第一種。大一些的東

西，例如石塊，大樹的老根，無論水流得如何湍激，是絲毫不動的，可以算第二種。澗床深處，有許多魚，頭部一律向着上流頂着，魚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好像爭着往上流遊去，却是並不見有甚麼進步。他們是潮流中的掙扎者。

人世間，社會上，思想界裏，若是真有像潮流一般的現象，那末潮流中的分子——人——應付潮流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幾派。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總是跟着走的，便好比澗水中的殘花落葉。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總是困守着不動的，例如一部分食古不化的前輩，便好比山澗中的頑石。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面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掙扎，不肯輕放一着的，畢竟是

少數有見識的人。在學問界討生活的人應該就是這第三種人。他們好比山澗裏的魚，和潮流有相當的關係，却不會捲入旋渦，演滅頂的慘劇。

這都是常識，盡人而知的，但是近來似乎有一派哲學家在那裏告訴人說，凡是已成爲潮流的東西，我們都應當加入，應當順應。爲甚麼呢？一種事物而能成爲潮流，能獲得相當的聲勢，一定是經過了經驗的盤駁的，一定是經過了生活的顛撲而不破的，實言之，一定有他的價值。

這似乎是極端實驗主義的論調；他的是非我們可以不必管他，不過我們有一點懷疑。近代所稱的『潮流』和前代所稱的『風』似乎

是沒有多大分別；要是潮流沒有不是的，那末，以前的風，如風氣，風俗，風尚，推而至於一切社會公認的習慣和觀念，當然都有他們的是處，我們有何必加以批評攻擊呢？

依我們看來，潮流就是風尚，他們是不一定有價值的。尤其在這個只普及識字而未嘗普及教育的時代，一種思想，一件貨物，可以因普遍的廣告方法，而立刻得捧場的人物，得到一種浩大的聲勢，這種聲勢甚或可以歷久不變。在學問界討生活的人，在此種所在，應當知所趨避取舍，做一個時代潮流主動的引導者，選擇者，却不做祇是被動的順應者。至少也應當做一個掙扎者，庶幾對山澗裏的魚可以無愧。

觀點

談學問的人動輒要談觀點。

三四個人討論一個問題，費了許多唇舌，得不到一個可以共同承認的結論。便有人說，各人的觀點不同，所以要有結論，自然也是各不相謀的。或是你我彼此爭辯，最後的收場，雖不致不歡而散，也只落得一句：我和你的觀點不一樣，或是根本相反，自然是談不上軌道了。

這是常有的事。且並尋常到一個地步，令人不由得懷疑：觀

點兩字，似乎已經成爲辭窮理屈者的護身符。令人不由得懷疑：在這個侈談觀點的世界裏一種事物還有沒有是非真僞的定評。因爲據他們的說法，似乎一切觀點都是有是處，並且是到同一的程度。觀點的濫用，竊以爲有三四個原因。

第一，只知道自己的觀點，而不兼顧別人的觀點。就是，不明白做學問的恕道。換言之，也就是不明白綜合觀察的原則。不過這個弊病，犯的人雖多，却犯得還不算深。你和人家討論，至少可以聽到這一類的話，如同，我何嘗見不到你的方面，我何嘗不設身處地，等等。他未必真見到，真能易地相處，不過他在原則上既還明白，他至少不能不故作不偏見的代表罷了。

第二，不了解觀點差等的原則。一切觀點不能有同等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除非一個問題是渾圓的，也除非我們觀察者和問題的距離，都是一樣，我們所觀察到的各方面，自然不免有大小精粗廣狹的差別。這個原則，不比前一個，似乎還沒有得到一般從事於學問者的清切的認識。例如一個社會病理的問題，若犯罪行為，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可以用許多觀點來觀察他，經濟的，法律的，生理的，心理的，倫理的……；但是這許多觀點的價值決不能一樣。社會對付犯罪行為，最初是完全根據法律和倫理兩個觀點的；後來漸兼顧到經濟的觀點，認定犯罪和生計有密切的關係；到了最近，才看出犯罪行為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理與心理的。因為研究的功夫有進步，

才看出一個問題各方面的大小輕重，才了解觀察一問題時，立腳點也有大小輕重。

第三，不了解同一觀點，在異樣情勢之下，可以有不同等的價值。這在固執一個觀點的人不能了解，自然無須說得。就是懂得觀點差等的人也未必完全了解。但是我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遺傳和環境，究竟那一方面重要，互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辯論過。其實是不難答覆的。從自然界全般看去，天地的環境先於生物，也就先於遺傳；我們推想將來，生物可滅，遺傳可滅，而天地的環境比較常存；換言之，即環境為常，而遺傳為變。但自純粹的生物學方面及社會演化方面看去，二者的關係恰恰與前相反；生物遺傳所憑的

精質或種質，初不因普通的环境而發生變遷；我們行事，祇可以拿環境遷就遺傳，而不能強遺傳遷就環境；換言之，即遺傳爲常，而環境爲變。同一遺傳，同一環境，而價值的輕重竟可以對換若此。

我們對於這二三單面的原則如能切實體會，許多無謂的觀點上的爭論和故步自封，就可以倖免了。

商化，民化，與報紙

自八月初改組以來，不及一月，學燈討論學術的文字前後間斷過三天。這的確是自從創刊以來學燈所未曾有過的經驗。從前學燈的全盛時期，篇幅之大，文字之多，固然不用說了；就是比較衰微的時候，至少也有一篇半篇的學術文字來撐場面；此番的間斷却是絕對的。

此次的間斷，不特讀者引為詫異，就是編者自己也覺得奇怪。何以呢？稿子是每天照例發出的，並且據說是照例排好的。然而

終究間斷了。編者夜間七八點鐘發稿，發完了就離開報館，以後的事就不接頭了。所以學燈稿的間斷，編者雖覺抱憾，但不負何等重大的責任。這是先要向讀者聲明的。

朋友們說，學燈學術文字是鄙人編的，教育界紀事是另外一位編輯先生編的；所以停止學術文字而不停止教育界紀事，似乎專向鄙人開罪；應該向報館東家或向總主筆說一個清楚。鄙人不敏，然而所見却不如是之淺近；報館東家和總主筆都不是聖人；既不是聖人，便不能不受所謂時代潮流的支配。他們受了支配才把學燈學術文字部分停止的，與他們自身何干？『時代潮流』中最引人注意的有兩派：一是民化，一是商化。

民化有許多好處，但於學問一道，却往往不利。有一位美國教授批評平民教育說：你可以教他們怎樣讀書識字，你却不能教他們讀甚麼書，識甚麼字（You can teach them how to read, but not what to read）。所以美國人人能設看報，街車上真是人手一編，但是他們看的日報有三四個必須的條件，一要有照相，二要有滑稽畫，三要有『社會新聞』；這第三條最重要，因為裏面講的都是姦盜邪淫的新聞。你要他們識字，自然不難，讀文章，也不難，你要他們揀選了，識甚麼字，讀甚麼文章，却真難。

中國報界近來也把這幾個祕訣學到了。照相要相當本錢，所以除了時報以外，少嘗試的。滑稽畫也不過具體而微，因為中國畫術

界尙闕乏此種人才。但有所謂『報屁股』者，似乎可以勉強作替；而一班小報，幾乎完全在這一個條件上用功夫。至於第三個條件『社會新聞』，則偌大上海，俯拾卽是；所以時事新報創之於前，新聞報，時報繼之於後，近來已是十分風行，大有舉足輕重，可以左右一種報紙的銷數了！

報紙畢竟是一種營業。提倡民智，鼓動民氣等等未嘗不是很好的社會責任；但要盡此責任，非有少數人物肯提高身價，甘受經濟的壓迫不可。但在今日中國社會裏，這種人却尋不出幾個。大多數的人發一議論，辦一事業，一端既要顧到『民之所好』，一端又要顧到『利之所在』。在今日的世界，碰巧『民之所好』便是『利之所

在』：換言之，民化與商化，相成而不相悖；於是一切社會舉措乃有江河日下之勢了。

學燈向來是不甚時髦的。從前學堂開着，中學生大學生等，因為習慣關係，不能不看看。如今學堂多關了，學生星散了，學燈即使有一線光明，有少許指引的效能，似乎也用不着了。所以——揣東家和總主筆先生們的意思——當報館減政，縮少篇幅的時候，『社會新聞』不能減縮，『報屁股』不能減縮，廣告不能減縮，可以減縮而不妨礙營業的惟有學燈。但是學燈也不能全部間斷，至少教育界紀事要保留着，因為中間登載的無非是教育界個人或團體的廣告，為他們登廣告，也就為本報在學界方面推廣銷路：這又是商化之賜了。

讀者諸君，如以學燈的開斷爲可憾，請於近代所謂時代潮流者加以推蔽，與以指引。僅僅責難編者是無用的。人定勝天，天亦公。

『著作狂』及『發表慾』

我聽說海上某大學的學生對於出版事業異常踴躍。普通的大學祇有得三四種刊物，年報月報週刊之類似乎是都與體面攸關，不可或闕的。但是這箇大學裏，月刊週報，分門別類，竟不下一二十種。內中有用鉛字排印的，也有用膽寫紙油印的，甚至有由編輯先生或撰述先生們親手抄錄的。人工用得最多的，似乎最是洛陽紙貴，所以每期的出品大率貼在學校園內一方大草地中間四五條岔路口的一塊條告板上，好教同學們人人得先觀之快。

我朋友的朋友某君年前出版了一種文藝的刊物，一人獨自著述，獨自編輯，獨自出資印刷，獨自校對，獨自發行，到現在已經出了一期還不知兩期，但據說還要繼續下去。

體面一些的大學都有所謂年報或年刊的發行，他的內容，除了編輯先生們的玉照而外，還有許多——也無非是玉照，有箇人的，也有團體的；在箇人的玉照下面，往往加上一些此人在功課外作的業，箇人抱的宏願大欲；編輯先生對於他的月旦評語，有時也附帶的寫着。這種一年不過一度的刊物大都印刷裝訂得異常講究，因為，據他們講，他是有永久的歷史的價值的。

這種種現象，有人總稱之曰：『著作狂』，又曰，『發表慾』。

狂字當然不妥；至於慾字，在科學的心理學裏，究竟指甚麼東西，我們也不清楚，但覺得近年的知識界最確有『按耐不住』的一種傾向，一種量方。有編輯和集稿經驗的人都是這樣說。

這種慾望，大家知道，是很新的，和以前著述界『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慾望似乎是很相反的。以前著述的人比較為數甚少，著作之後，有力量付諸割剗的人為數更少；能够在生前見到自己的作品流傳的人更是寥寥無幾。現在呢，例如我昨天晚上寫着這一段『發表慾』的文字，我今天早上就可以看見排印出來。不過我們要了解，古今著作界的心理終究是一樣的，一樣希望把作品流傳出來；不過以前因為種種物質上的設備太缺乏，這種希望不能立刻實現，祇好藏諸

之身後了；甚或以退爲進的說他的作品根本不希望流傳。到了現在，因爲物質的設備很便利，所以著述少的便著述多了，不著述的也著述起來了，甚至完全不宜於著述的人，也起了倖進之心。同樣的一種慾望，但是今人要比古人發展得厲害，幾乎到了畸形的地步，這種分別是的確有的。

不過發表慾的畸形發展決不止因爲物質設備太便利的緣故。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著作界沒有公認的標準。一篇文章，一首詩，究竟寫得怎樣，才算好文章好詩；一個做文章或做詩的人究竟做了怎樣好的文章或詩，才可以稱做一個作家或詩人：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標準。即就學燈半年以來編輯『書報春秋』的經驗而論，讀者

對於一種作品的毀譽，往往絕不一致，尤其是文藝的作品，尤其是創作的文藝。著作界既沒有相當的刀尺隨時加以剪裁量斷，各種長短短不長不短的出品自然是紛至沓來了；輕於嘗試的作家自然要多於過江之鯽了；換言之，所謂『發表慾』的一種心理傾向，自然不免漫無限制的發展了。

第一、在... 第二、在... 第三、在... 第四、在... 第五、在... 第六、在... 第七、在... 第八、在... 第九、在... 第十、在...

入學試驗

入學試驗有幾種功用。第一，維持或提高一個學校的課業標準。第二，求同級學生程度的比較劃一。第三，維持學校風紀的整飭。第四，根據了入學試驗的成績，可以預測未來三四年的各個學生的造詣深淺。

要得到這幾種功用，入學考試的考材和手續都不能無一定的標準，並且年去年來，不宜輕易更動。例如美國大學裏，我們都曉得哈佛大學是最有名望的一個，這種名望一部分其實就從不輕易接受學

生中得來。中學的畢業生，許多大學肯容納的，哈佛大學往往不肯收受，因為他有比較嚴格的標準，而穀得上這個標準的人比較要少。這種標準便包括在入學試驗裏。自從各種教育測驗發達後，入學試驗也參用了他，來推測錄取各生的前程：有的不上三年，有的不上二年，一年，便要因學力不足而退學，都可以預測得很有把握。

國內各大學，對於入學試驗，似乎並不十分重視，有的簡直不當他一件事做。考試的題目大都是一二人的急就章，不用說了。甚至監考閱卷都沒有特別負責的人。某年上海某大學招考大學一年級生，因為尋不到監考的人，急忙中就請了幾位暑期留校的高中生，以高中學生監考大學生，真是有趣極了，真可以算得開中

外古今教育事業未有的先例。每個大學總有一個招考委員會，但事實上招考委員幾乎成了一種名譽職，很少做事的。

不注重入學試驗的結果，不特一個學校的課程標準，不能確立，或一年要低似一年，就是平日教務上，訓育上，也要發生許多困難。當此學風不靖的時期內，因為一二學生的偏激的信仰，往往可以引起很大的風潮；不僅是平日訓育上發生困難而已。這是近年來已經數見不鮮的。

讀過孟子的也許還記得他有一段很有趣的軼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入求之弗得。』當時便有人疑心是孟子的門徒偷的，就向孟子算賬。『若是乎，從者之度也！』孟

子說：『子以是爲竊屨來與？』那個人總算客氣的說：『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來者不拒』一語的意義是很清楚的。『往者不追』一語，作『不追究來學者以前的生活』講。因爲不追究徒弟們以前的生活背景，竟把毒手都招進來了！孟子是一個唯心派的教育家，他當時也沒有種種比較客觀的挑選學生的方法。但是今日我們談教育，在原則上與方法上似乎都應該比孟子多懂一些。

聽說最近上海某大學某次招生，投考的一百四十六人中，錄取的多至一百四十五人；那未錄取的一人交的是白卷！可

見，很不幸的，這一篇小小的討論至今還未失時效。

光旦補識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我記得論語上記着下列的一段話：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論語先進。）

子路以爲爲了民人爲了社稷服務，服務期內所得到的經驗，便是學問；不必一定要在學問上先有了預備，就是先讀了書，才可以服務。孔子却以爲預備功夫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認爲子路的舉動不免貽誤人家。

我又記得美國有位前輩動物學家叫做亞格西慈 (Louis Agassiz)。

一八〇七——一八七三) 的說過一句話：

要研究自然，不要研究書本。(Study nature, not books.)

孔子要人讀書，這位動物學家不要人讀書，到底誰是誰非呢？

我看都是。我們不妨推敲一下。

動物學和其他自然歷史研究的對象便是自然或自然的某一部分。

自然的現象或事實是比較確定的，比較易於捉摸的，所以宜於直接的觀察，不必借重前人的成績；在初學的人，尤其是應當養成獨立觀察的習慣，不依賴成說，不人云亦云；否則名爲研究自然現象，實際上不過記誦別人觀察自然現象後在白紙上的一些影射罷了。這是一

層。自然界的事物，大部分是無生命的，小部分是生命而無意識的。還有更小的一部分是略有意識而沒有價值觀念的；所以，他們不但可供直接觀察，並且宜於反覆試驗，而不至於發生是非的道德問題，利害的法律問題，即不至於發生責任問題。質言之，自然現象的研究，不妨常用『嘗試和正誤』的方法。這又是一層。

但是社會的現象不然。他們是比較不很確定的，比較不易於捉摸的，所以大部分不便於直接觀察。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除了當時當地的社會狀況可以用實地調查的方法而外，大部分的工作不能不用所謂人類學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換言之，即不能不取材於種種人類學的和歷史的記載；材料的正確不正確就全憑取用者眼光的精到不

精到了。這是一層。社會的現象便是許多人綜合行爲的表現，他不但有生命，有意識，并且到處受嚴格的價值觀念所支配，所以不特不便於直接觀察，更不便於反覆試驗。若有人輕於嘗試，便立刻可以鬧出亂子來。這又是一層。

要了解社會現象，尙且不能輕易嘗試，何況要指揮駕馭社會現象呢？所謂政治者無他，便是這種指揮駕馭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更不是率爾操觚者所能應付的了。子路在孔門列入政事科，時常聽見同學們所發『某可使從政也歟？』一類的問題，但是他始終沒有了解政治事業，關乎人羣的安危利害，萬不能讓人用嘗試和正誤的方法來開玩笑，即不能不利用前人的經驗成績，即不能不先有理論上的訓

練和修養，一言以蔽之，亦即不能不先讀書。子路既不了解，又從而爲之辭，無怪孔子要罵他『賊夫人之子！』和『惡夫佞者！』了。

我提出子路這幾句話來討論，是有原因的。我覺得近來談政治和勸人加入政治事業的人大都犯這個通病。當初子路的用意，要是用現代的名詞傳達出來，不就是：『有民衆焉，有國家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麼？說得再親切些，不就是『有政治工作焉，有黨務工作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麼？邇來高等教育毫無生氣，而政治工作未見得有多大起色，我以爲這種子路派的謬誤觀念着實要負幾分責任。

「速成」

「速成」兩個字是一二十年前教育界中人所耳熟的。我們中間比較年長些的都知道從前有過一個速成師範，造就了不少教員資格的人；當時速成的風氣的確很盛，不逞之徒竟有借了他的招牌斂錢的。我記得有一個笑話說：少數不學無術的人設立一個『中西速成科』。招牌上却大書著『申酉速成科』！這當然是笑話，不是事實；不過很可以反映出當時的風氣來。

現在速成的名稱不時髦了，環顧學校林立的海上，差不多沒有再

用他的。不過『速成』的精神却始終是中國興辦新教育（學校教育）以來的一大特色。習藝性質的學校當然利在速成，可以不必說他。但是專門教育大學教育的機關也往往如此；在學生方面，亟亟於『學成』致用，竭力的想把年限縮短，把學分減少；在學校方面，爲經濟計，也就竭力遷就，甚至於故意在學分年限兩端上不露痕跡的打些折扣，以廣招徠；於是此推彼挽，而速成的精神乃日益牢不可破。

速成風氣所由養成的原因不止一端。一方面有『學成致用』的舊的教育觀念。自來讀書的人，上焉者爲的是『明道』，中下些的無非着眼在一個狹義的用字上；西方人客氣些把致用二字釋做『爲社會服務』，中國人不客氣些，便直截爽快的說爲個人與家庭謀生計。

因爲中國人口多，謀生不易，所以學問的目的不但是致用，並且要致用得快；於是速成的原則便應運而生了。第二個重要的因緣，便是近來學制的紊亂和不嚴密。從中學到大學，一個較點些的學生，可以用轉學的便捷方法，東一轉，西一轉，在年限上與學分上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宜』。在學制不嚴密學風不整飭的時期內本來不宜重用轉學的方法來招學生；然而近來這種方法非常之盛行；而於真正可供甄別的入學試驗方法大家反不措意。末流之弊，弄得入學的手續，成爲學校和學生間一種討價還價銖銖必較的行爲。

別的事功也許可以速成，但是學問這種事功似乎是根本不能速成的。學問是積銖累寸的東西，也是沒有涯岸的東西，平常我們講一

個『成』字，例如從前禮記上所講的大成小成，我們自負的心理已經夠大了。何況是『速成』呢？學問只有造詣深淺，却沒有最後的成就，更沒有走馬加鞭的成就！

造詣有深淺，也確有快慢，深淺快慢一半靠功夫，一半靠天分。天分高的人未嘗不可提高他學習的速率，若說這種人未嘗不可以『速成』，亦無不可。不過天分高的人是不多的；他的所謂『速成』是完全時間上的，至於應當學習的東西，注意力應當及到的地域，却並不絲毫減少。現在我們普通所經驗到的『速成』却不如此，因為要求時間上的縮短，便不得不在空間上——即學習功夫應及到的地段——打一個很大的折扣。例如速成教育所用的講義，無非是擇要中

的擇要，大綱裏的大綱，做學生的即使把他完全記誦熟了，也十有九個是囫圇吞棗的。

囫圇吞棗的成就，爲個人計，未嘗不可用以欺世盜名，但對於這行學問，對於社會生活的實際，是害多而利少的。

『欲速則不達』，尤其是在學問方面。

『速率』並不等於『效率』，事事學步歐美的我們，似乎應當先留意到這一點，尤其是在學問方面。

完人教育新說

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徽是一個三角圈。他有兩種意義：在神學方面，指着三位一體；在個人修養方面，代表德，智，體，三育。一個人如在身，心，靈三方面都能發展到相當程度，這個人就可以稱做『完人』了。

這是青年會創立時所規定的；但是近年來，從事的人覺得至少還有一方面應當加入的，就是個人與個人的相互關係。身，心，靈的修養始終是個人的，在靈的方面，未嘗不講求『神我相與』的道理；

但是『人我相與』應當怎樣，便完全沒有提到。所以，他們於德，智，體，三育之外，又添上一個『羣育』。

蔡子民先生曾經提倡過以『美育』代宗教。上月中央四次會議時，褚民誼先生提議根本改組黨部，把他分做德育，智育，體育，羣育，美育五大部，使黨員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發展，不但成一個合格的黨員和國民，並且成一個完全的人才。如此，除了青年會歷來提倡的四育之外，又添上一個『美育』；成爲五育了。

吳稚暉先生以爲今日的中國人，在講求各種發展之先，第一要有飯吃，要有能力吃飯；胡適之先生拜金主義的說數，底子裏也不外這個意思。中華職業教育社提倡職業教育本已有年，最近復有職業指

導運動的舉行，好像和吳胡兩先生的主張彼此呼應。這種發展吃飯能力的教育，即是職業教育，我們不妨稱他爲『富育』，以與其他各育的稱呼相配稱。這裏的富字自然不作『爲富不仁』的富字講，却作『既富而後教之』的富字講，便是求生計上有相當的餘裕。所以，除了上文的五育之外，我們應當把『富育』也加進去。

綜合起來，似乎完人的教育至少有六大方面：德，智，體，羣，美，富。這六個方面，照上文的敘述方法，似乎由我個人東拉西湊而成的。其實不然。我記得歐美社會學者論文明人類的社會旨趣，歸納的結果，也就不過這幾方面。例如美國社會學前輩司摩爾 (Small) 便把一切社會旨趣歸納成：關於健康的，關於財富的，關於

道德和宗教的，關於美的欣賞的，關於智識的探求的，關於政治和
我交際的，六大類。這不恰恰合着我在上文所提出的六大方面麼？
文明的社會裏既有這種種旨趣，教育的指望也就要各個人對於這種種
旨趣，有充量的取和充量的與，即充量的貢獻，和充量的享受。

話雖這樣說，我們還沒有見過從事教育的人採取這種多邊形的教
授方式的，事實上恐怕也無從採取。第一，這種種方面，實際上不
能絕對劃分。例如，德育和智育二者，如若我們把『智』育純粹當
作知識的獲得，還可以，如若把『價值觀念的養成』也包括在內，那
就和『德』育分不清了。又如德育和羣育，如若我們採用基督教徒
的見解，把『德育』解釋作『靈修』（姑不論靈字究作何解），也還可

以；如若採取近代社會學的見解，以爲道德生於人我相與，卽道德是社會意識的產果，卽道德是屬於人羣的而與神道無干，那末，德育和羣育也就根本沒有分別了。第二，人類生來的稟賦不同；所謂不同者，不但指各個人間的稟賦不一樣，也指每個人得自遺傳的各種品性，根柢上有強弱之差；所以，不特各個人間不能有同途的發展，卽一個人的各品性間也不能有等度的成績。我們見人家恭維青年人，常說『三育並進』一類的話，我們明知道是不確的。第三，種種社會旨趣，在同一時期與環境內，並不有同等的價值。中古時代歐洲的宗教社會重『德』，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重『智』重『美』，今日的美國很推崇『富』。凡有一方面受特殊的推崇，其餘的方面都

要被抹殺，或被利用來作推崇那一方面的工具；例如重富的美國社會和不得不重富的中國社會裏，宗教界中人（德），教育界中人（智），藝術界中人（美）……所以日以孜孜的，無非爲錢，爲喫飯。各種社會旨趣的價值既有軒輊，那末個人的品性即使有平衡發展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平衡了。

完人教育是很好的一個目標，但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然而爲社會的演進計，我們不能不向着這個目標走去，不過我們須要改換進行的方法。我們第一應當廢除以前『方面』的觀念，取消『德育』『羣育』『美育』一類中聽不中用的口號。第二，我們要提倡一種——無以名之，姑名之曰——價值意識的教育。我國古代的智字，

不止指知識的獲得，也指價值意識的培養。西文中的 *wisdom*，也是這個意思。近人把『德育』和『智育』完全分開之後，於是『智』字的本義轉晦。價值意識之發達，用之於理智，便知是非真偽的區分；用以待人，便識善惡榮辱的辨別；用以接物，便識利害取舍的途徑；甚至藝術家所稱『賞鑒的能力』，即美醜的辨別力，西文所謂 *taste*，也無非是價值意識的一部分。從價值意識一端下手，則凡天分不是下愚的人，都可以得到相當的造詣：因為，是非真偽的辨別力不限於科學家和邏輯家，善惡榮辱的辨別力不限於羣性特殊發達或善於交際的人，利害取舍的辨別力不限於持籌握算的商業鉅子，美醜精麤的辨別力不限於詩人，畫師，或雕塑的專家。質言之，價值

意識發達一分，辨別力便強一分，其人行爲上便多一分裁制，多一分自主的能力。誠能如此，則去完人的鵠的，雖不中，也不遠了。

尙同與尙異

太平導報太平民作尙異三篇，論尙異尙同和治亂的關係，很是鍼對今日時局的一篇文章。

但是我很懷疑『尙異』這個名詞。

統觀宇宙，上自星象的形成，下至人類的蕃殖，自其動者而觀之，無處不是『變』，自其靜者而觀之，無處不是『異』，自然歷史家名此種現象曰：變異。再就人類自身而論，有性別，有年齡之別，有種族之別，更有智愚能鄙賢不肖之別，而智愚能鄙賢不肖之

間，更有程度之不齊，流品之不一。自生而知之的上智至困而不學的下愚，中間可以分出許多等級來。這是程度上的不齊。社會分子裏有畫師呀，樂工呀，詩人呀，科學家呀，優伶呀，律師呀，……。這是流品的不一。不要說人人不能有做律師，做詩人……的希望，要使這許多互異的品類易地以處，怕就絕不容易了。社會生物學家根據了變異的概念進而名此種流品的不一致，曰：多形現象。

變異既是一種普遍的自然現象，有如上述。自然現象是自然發生的或有自然發生的傾向，我們若承認這一層，便知『尙』亦異，不『尙』亦異。我們若以變異的傾向是可欲的，則任其自然可耳，不加以抑制可耳，何必『尙』？

社會的位育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位，即是秩序，秩序的根據是社會分子間相當的『同』；一方面是育，即是進步，進步的根據是社會分子間適量的『異』。『同』而過當，社會生活便日趨保守，甚至於腐朽以死；『異』而逾量，社會生活的重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二者都是不相宜的。為社會秩序計，『同』非不可欲，然而不宜『尚』，中國史實早已昭示與我們了。為社會進步計，『異』當然可欲，然竊以為也不宜『尚』，尚則也不免有流弊。

尚異的流弊如何，在中國尚不多見。美國社會以尚異稱，好處固有，害處亦不在少數。小而言之，社會分子的二言一動，在在標

新立異，炫人耳目，在在求他們所謂 *sensational* 的東西或行爲。這種情形一經普遍，卽成一種浮誇放浪的風氣；再要糾正他，便是社會教育的一個大問題了。

中國向無『主義』這個名詞，有人要提倡推行一件事物，只說一個『尙』字。中國更無『反……主義』這個名詞，要排斥攻擊一件事物，只說一個『非』字；所以『尙同』就等於『劃一主義』，尙異也可以名爲『維異主義』。凡是主義這樣東西，要是常在幾位哲學家的口裏，不吐出去，還鬧不出甚麼大亂子來，至多宜告幾次『論戰』罷了。但一旦要傳到民衆的耳目裏，局面就可以立變。本來是一個假定，是一派理論，如今便成一條真理，一派信仰；本來祇供

少數人辯難的資料，如今却成多數人呼嘯的口號，反覆言之，祇有主義可以號召羣衆，羣衆接受這個主義之後，這個主義就成爲絕對的一種信仰，成爲團體行爲的一個大原動力。黨同伐異的心理現象便是這種團體行爲必然的一部分。

這種心理現象是容易解釋的。『黨同』可以說完全是模倣本能的產物，是求同意識的產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所以只要有少數有名望的人出來提倡，沒有一種主義不受羣衆的歸附的。模倣性和求同意識爲政治社會成因之一，已是一種通論，不用我多說。然黨同何以必伐異而後快？同者本不必黨，既成了黨，既稱曰黨，便包含着排斥不同者的傾向。故黨同與伐異可以說是一件事物的兩方

面，本來分不開的。不過此外尙別有說。孔子嘗論小人患得患失的心理。沒有得到，百計以求之，所以要黨同，所以要樹聲援；得到了，又惜不能保守，所以要伐異，以防他人『拆臺』。如此解釋起來，似乎目下種種黨同伐異的社會狀態畢竟是一個經濟問題，亦是一個人品問題；尙異之論，縱可以挽回局面的一部分，若說解決，我恐無此能力；何況末流之弊，方向雖不同，而程度或與尙同論的相等呢？

尙同的末流是劃一主義，統於一尊主義。尙異的末流是爭奇炫異主義，無標準主義。都要不得。我們要的是一種容忍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才可以求同而不黨同，求異而不矜異。趣同變異本

屬社羣生活裏兩種自然的傾向，只要我們無黨無偏，一端不加限止，一端亦不加吹噓，便不復有有餘不足之病，可使相反者實相成，而社會秩序與社會進步兩端自都不患無保障了。

近人評論到此層意思的很多，然而我總以爲他們都被名詞誤了。他們動輒講『自由』。其實『自由』這個名詞甚不妥當。自由的概念本來很捉摸不住，引用起來，每須註解，例如在法律範圍以內的自由呀，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爲自由呀……後面一說更是糊塗。實則『自由』就等於『要別人容忍』。如今祇說自由，字面上看去，好像祇爲了自己着想，沒有顧到別人；事實上也確有人如此看法，自由變成自肆，社會因而蒙其大害的。『容忍』不啻指人都適用，

而隱含人都適用，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我即自由，不比較妥切麼？

總之，在今日是非標準混亂與羣衆心理澎湃的時代裏，最好不『非』甚麼，也不『尚』甚麼。要知道在『非』與『尚』之間我們的心態未嘗無中立的地位。不尚同並不等於反同，不尚異未必就是伐異。這個中立的地位並不是消極的，並不是熟視無覩，並不是袖手旁觀，並不是裹足不前；，有了這個中立的態度，才能設客觀，才有資格可以批評，可以採衆長，可以真正的建議而無顧忌。要養成這種態度，第一步要下容忍工夫。

中國今日之社會科學教育

論社會科學教育不外四端：一曰教育之動機，二曰學問之內容，三曰觀念之養成，四曰方法之講求。今就此四端以繩今日中國之社會科學教育。

當先論茲四端者應有之程序。教育之動機，不論其爲辦教育，抑爲受教育，最爲先決問題，自不待言。其次應講求學問或教材之內容。又其次爲觀念之形成。及學問漸有根柢，觀念既經形成，乃進求研究之方法，更事深造。

教材而充實，則觀念不蹈空洞之弊；教材而周備，則觀念可免偏激之患。然今日中國之社會科學教育鮮足以語此也。姑不言教材之充實與周備，即觀念與學問應有之程序且有顛倒之勢，在辦教育者大率有其確定之哲學觀念，在彼雖力持觀念不偏蔽而學說宜共通之原則，願其於學校政策方面已難免不生影響。在學生方面，此種先入之觀念，來自二源。邇來國內關於社會問題之刊物，多不勝數；其中材料屬意見與理論者多，屬經驗與事實者少；且派別分明，標榜各異；青年日濡月染，隨其所習見者而自成觀念；及其入校則挾與俱來。此一源也。設不然者，入學校之後，如主持之者為有魄力有主見之人物，則鮮有不受主持人物之潛移默化者，其點者且盡體會與

合之能事，卒以學校當局之觀念爲己之觀念焉。此二源也。

觀念既先入，而再事學問，則敏慧者勢必以其觀念繩學之所得，其與觀念合者則習之，不合者則捨之，於是偏激之大患不可倖免矣。遲鈍者一端挾先入之見，一端亦未嘗不察其所習者時或與其成見相衝突，必至思考縈迴錯亂，莫知適從，亦大弊也。

下文分論動機，學問，觀念，方法四端。

教育之動機。辨社會科學教育，有動機絕對顯著，甚或特別標

明，例如革命政府在武漢新設之軍事政治學校。若是者，其旨本不重養成絕有科學精神之人才，可不具論。我當就宗旨不偏倚而實際行事亦力求純正之學校與學生，略作求全責備之論。嘗默察從事社

會科學者之基本心理，以爲有亟宜改正之二端焉。

一曰因人成事之心理。我所謂因人成事者非指依賴性；相當之依賴行爲實爲社會生活所不可無；乃指個人觀念之強烈，而組織觀念之薄弱，西文所稱 *personal* 之心理而已。學校爲一種組織，而組織之良窳由人，然求學者或不問組織之良否，亦不問主持者何人以斷定其良否，第問何人辦此學校，甲辦則入，乙辦則否，於組織之如何不顧也。例如入政治大學者，大都慕張君勱先生之名，然詢以政治大學共分幾科，尙有入校已久，而矇目不能對者；此我所親見者也。若是之心理我國向無適當名詞，今我姑假因人成事之舊說以括之。此種心理之不健全，自無待論。中國官場，一人得勢，則其夾

袋中人物隨之得勢；一人下台，則其夾袋中人物與之俱下；是豈忠於領袖之心理爲之耶，殆不然，因人成事之心，相沿成習，不得不爾也。何以知之？甲之人物未嘗不求蟬聯於甲去之後，願甲去乙至，而乙亦自有其夾袋中人物，甲之人物欲求不去而不可得矣。職是之故，中國政治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之生命幾完全繫於一二個人之身，人在政存，人亡政息之大原則，幾若爲此種不健全之現象言之，甚可慨矣！

二曰學用劈分之心理。學成致用本爲有相當價值之舊說，今亦發生問題矣。其患在學者將學用二字看得太分明，而用字之範圍又看得極偏狹。今日習政法經濟之學者，猶大多數抱學優則仕之心理

者也。誠能學優而後作官，固未可厚非；顧此種偏狹之心理橫互於心，則大率今日之學不能優可必，而他日仕之優否不可必矣。何以言之？一學問與職業既視作截然二事，於是學與用之密切關係不可復覩，而學非所用與用非所學之現象觸處是矣。中國學生多學不計用，故除書本外幾不言學問。中國人事職業，又多用不謀學，故一有職業，便不續求學問，往往並書本生活而無之；甚至以教讀爲職業者，亦僅知翻熟幾本舊教科書，不復他求。凡此現象，無非學用劃分之心理爲之厲階也。

欲祛除此種心理，當先明學問爲體，職業爲用，學問爲機括，職業爲效率之道。體用不可須臾離，故作學問時卽求相當之效率，使

不覺其厭倦；而從事職業時尤不能不竭耳目思考之力以求機括之日臻美備。唯如是，始可與言生活之日進有功。

學問之動機既確定，則學問之內容，由學問歸納而得之觀念，與進而續求深造之方法——種種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不然者，此數者隨之而日即於偏激，片段，浮薄，模糊種種弊病。此固推論，然亦可察事實而知之。若今日者，固觸處皆此種事實也。

學問之內容 今日之大學生於書本生活講義生活外無學問，前已言之。而今日之書本又多為英美舶來之品，而講義亦往往為轉輾傳鈔之結果，與中國社會實况每多鑿枘。攻錯他山，實逼處此，今姑不論。然即此書本與講義生活已大有令人不能滿意者：一曰不

務基本，二曰不求縝密，三曰不識取舍。

孔德論學問之階梯，以社會科學爲最後之一級，良以其內容最複雜，而_也之者不能不有深邃之根柢也。此種根柢學問，我輩今日約分爲二類，一爲自然科學，一爲數學，後者可兼邏輯而言之。自然科學中尤以生物學與演化論爲重，以其與社羣生活關係最切也。習自然科學，所以求事實與原理之正確與精到，習數學，所以求方法之不苟且；數者皆爲思想鍛鍊所必須之條件。今日國內之社會科學教育，殊未足以語此。設備上不無困難，固屬事實，然自然科學與數學之授受，每視若一種無可奈何不得不循行之手續，則大非所宜矣。姑舍基本科學不論。卽幾本通用之政法經濟教科書，學生之能

熟讀而洞察各種制度各種原則之因果原委者，恐亦不在多數。此則更可憐矣。此非學生智力不逮也，實乃不求甚解之浪漫心理爲之。此種心理，半爲舊式之記誦教育所養成，半亦由上文所稱學用剖分之觀念所致。學用既不甚相干，則學之可爲他日致用之資者，不外若干事理之原則與制度之大要而已，其細節目不必問也。殊不知細節目不明，則大要與原則亦無由切實了解，此我與學生接觸之實地經驗，當可徵諸其他作教習生涯者。

學者志在亟於應用，故於學但求粗枝大葉；及其結果，則並此粗枝大葉亦未能應用或應用而無當。其故安在？爲學不知分析者，鮮知評估，不知評估者，鮮知取舍；不識取舍，而認以所學於西方文

物者應用之於中國社會實況，宜其格不相入也已。及其格不相入，乃舍所學不用，日久卒受舊方法舊制度之同化，及其同化；乃謬曰：畢竟學問與經驗是二事，既以自慰，且以詔後之來者。此種現象實爲歸國留學生不足以取信於社會之一大原因。今國內之社會科學教育且起而追步之矣。因學用剖分之觀念，而得學不能用之結果；因學不能用，而學用剖分之觀念益牢不可破；此種兜不出之惡圈子一日不破，即中國社會科學一日不發達，而社會問題一日無清明之望；欲打破之，當自求學問之縝密與養成學說之判斷取舍力着手。

觀念之養成。專攻自然科學者，日所事事者爲客觀之事實與經驗，故觀念爲其餘事。專攻社會科學者，在在與社會利害發生關

係，即不能不力求觀念之正確，以爲判斷事物之根據。近二百年來西方社會問題之複雜與亟切難理，局部由於社會哲學思想之不健全，近已頗有人公認之。觀念之正確與否，與學問之內容有直接因果關係，前已及之。學問內容既有問題，則觀念自難倖免。此可分二端言之。

一曰觀念之混亂與迷離悖恍。此與觀念之多且複雜不同，觀念之多且複雜，未始非文化進階之一種表示，例如古希臘與我國春秋戰國之世。今則不然，目下流行之各種社會哲學觀念十九自西方移植而來，姑舍福渝爲積之理不論，即其持之者吞之囫圇棗，其黨同代異之精神，其刊物之充塞，其宣傳聲浪之喧譁，已足使人目眩神迷，

而使社會呈鼎沸之象矣。此其病根，當然不得不求之社會科學教育之不足與失當，無可諱言。

二曰觀念之情感色彩太濃。正確之觀念，爲思考之結晶，應爲一種冷靜鎮定之物。顧今日流行之觀念且與衝動無殊。一知半解者卽思作社會運動，某也持某主義，某也屬某派，某主義與某主義發生衝突，某派與某派積不相能；果何種主義與何派最有學理之根據，則鮮有人能言之，亦鮮有人求能言之也。是今日號稱青年教育階級之絕大怪現象也。某大學學生將出一種社會科學之刊物，其發刊詞中有曰『本刊擁護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而亦須擁護，可見今日中國青年之用心，誠無微不至矣！雖然，觀上文種種，可知社會科學行

且爲種種社會臆說所攘奪，科學精神將掃地無餘，則事實上又似不無擁護之必要矣，噫！

所謂社會科學之失當，不足，與須「擁護」者，上文固已歷數之。其所以然者，則基本學科之不講求一端已足以盡其說。今日流行之種種社會哲學觀念，十之七八不足經生物學與人類學之事實與原理之盤駁者也。不識此種事實與原理，則觀念當前，便不知靜觀默察，不知分析，不知比較，一言以蔽之曰，無以準繩而定褒貶取舍之方。一端觀念如蠟集，而一端所集中者又爲血氣方剛，理想方盛，而識量則未定之青年，宜學說之日亂，而社會問題之日亟也已。

方法之講求

此端就學問已具相當根柢觀念已略臻固定之從事

於社會科學者並言。中國學者向不甚講方法，人人知之，然至今日猶沿舊習，行見學問之日不如人，而將永作西方文化之寄生蟲矣。社會科學不若自然科學，不能求諸實驗，但能求之詳瞻之觀察；欲求詳瞻，不能不先求觀察之數量化，是統計學之所以重要也。顧統計學之不講求在今日之中國猶屬一普遍之現象。即就政治大學一隅而論，統計爲必修科目，然學生方面嘗一再請求改爲選科；其原因至顯著，一則學生之數學程度太淺，再則以持籌握算爲黷業之心理至今未破，三則大學以爲作實際政治者無須乎此種細節目。是又學用兩歧而爲學無須緻密之心理之又一證也。統計學，西文名曰 *statistics*，與國家 *state* 之一字同源，從事實際政治者因曰 *statist*，實際政治

家既曰 *statist*，則實際政治家之所務斯爲 *statistics* 矣。嘗以此語
政大同學，不禁爲之莞爾也。

圖文... 內容... 說明...